《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2026年06刊

我们是谁: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代，亦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能够更换天地的工人阶级力量，唯有匹配上最能引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带来社会主义的新生!
要建立先锋队，首先要抓紧理论斗争。《布尔什维克》旨在传播分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致力于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参考点，成为激进层、工人阶级乃至劳苦大众眼中解放社会的可见纲领和指针!
革命理论的传播需要更多的助力，如你也是同志，请联系我们、订阅《布尔什维克》月报、将我们的文章和频道转发给更多的左翼群体！或者向我们投稿!

官方网站：https://bolshevik.red/
联系与投稿邮箱：bolsheviks.red@proton.me
月报订阅邮箱：bolsheviks.sub@proton.me（订阅方法：向该邮箱发送任意内容邮件，亦可通过本刊电报和推特频道下载）
电报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推特频道：https://x.com/bolshevik_red?s=11
书籍推荐：《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
往期杂志：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

目录

(1) 社论:权贵飞扬跋扈，群众水深火热 11
(2) 台湾问题何去何从？ 15
(3) 中国帝国主义在中东 23
(4) 热浪来袭，汛期已至，荒漠洪水：气候危机出路何在？ 27
(5) 高考考生议政——为工人阶级而发声！ 33
(6) 论“混的人”和“崩老头”：青年人往何处去？ 37
(7) 广西地震：天灾还是人祸？ 43

短评

(8) 短评：“社会就不该给你们工作！”——巨婴资本家和沉默的青年人 47

转载

(9)国际特稿：以色列控制着美国吗？ 51

特稿

(10)女性解放专题：女性斗争与阶级斗争 63
(11) 共产主义问答：“没有独裁者，还有独裁制度吗？ 95

社论：权贵飞扬跋扈，群众水深火热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统治阶级看似非常风光。自从上个月访华遭到平起平坐地对待以来，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耻辱的投降书。美帝丧失国际名声的同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脸面。而国内貌似一切稳中向好，AI泡沫不断胀大，科技壁垒不断突破，出口和工业产值生产有所稳定。难怪统治阶级非常得意。

我们不能把统治阶级的智慧神话，认为其一切宣传口径都有冰冷的理性考量，有些时候他们是真心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尤其在其风光无边的当下，中国官僚或许是真心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行人，将民族立于世界之巅。

大中华民族主义目前仍然是官僚排除一切异议并正当化自己政权的看家法宝，“维护国家统一”当然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期《台湾问题何去何从？》由近期事件和一时爆火的军队宣传片《向大洋》入手，详细分析了为何中国持续在台湾问题上的文攻武吓以及台湾上两岸人民的真正革命出路。

此外，由于美帝的衰落，中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更多空间输出其资本。比如，传统来说是美帝占主导地位的中东地区就是如此。中帝国在当地实际的经济、军事、外交地位究竟

几何，中国群众是很少了解到的。这就使得本期的《中国帝国主义在中东》非常值得一读。

当然，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包括受资产阶级化的官僚支配的民营资本家。比起官僚惺惺作态的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姿态，民营资本则更飞扬跋扈。本期短评也锐评了近期热点事件之一，粉笔CEO张小龙大骂工人阶级失业是活该。

但是，除了统治阶级的丑恶之外，我们可以从这类文章中学习什么呢？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每当矛盾激化到了极点但爆炸的时刻还没有来临之际，总是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形：政治力量的分野不是在根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和次要问题上更公开和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这类事件虽然看似偶然，甚至可以说仅仅是次要的、量变性质的，但从群众激烈的嘲讽可以看出，这类舆论事件实际上表明，在深深的政治压抑之下，工人阶级的愤怒正在酝酿。统治阶级日复一日的羞辱，群众原本是能够不理会的，但在就业危机空前严重的今日，这就显得得寸进尺。这种事件的舆论潜力，不得不让我们想起2020年B站的《后浪》所激起的群众愤怒。

这种愤怒有明确的来源，就是他们愈发水深火热的生活处境。在全球变暖加剧的今天，这句成语开始脱离了隐喻性。

端午仲夏以至，《热浪来袭，汛期已至，荒漠洪水：气候危机出路何在？》这期文章就汇总了影响着全世界所有人的环境问题，并指出，解决气候危机的出路是愈发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在未来的中国，环境问题也会成为进一步激化群众的重要议题。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近期广西地震引发的群愤。在当今物资大大丰富的时代，天灾的发生与伤害只能暴露出贫富差距、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寄生性。本期《广西地震：天灾还是人祸》就旨在教导同志们，如何在全球变暖加剧环境灾难的今天，找出从中隐身的统治阶级，向群众揭露计划经济和工人控制生产、控制政府的必要性。

不过即使是人祸中，统治阶级也在想办法从中隐身。社会危机的持续也使得青年失业问题发酵。本期《论“混的人”和“崩老头”：青年往何处去？》一文就这种较为猎奇的社会悲剧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崩老头”这种青少年通过提供情感服务或是诈骗的现象之所以会盛行，是由于大量辍学的中小县城和农村地区青少年就学、就业无望，而城市工人则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倍感孤单。这一切都反映出资本主义下社会的扭曲。从中，统治阶级又完美隐身，占据道德高地的同时而避而不谈：究竟是谁让青年失业、让工人加班的，又是谁将农村吃干抹净呢？只有资本家和维护他们利益的官僚。

面对更深的社会危机，新一代青年则挺身而出，在各种场合寻找为民请命的场合。六月初高考结束，与往年的采访不同，许多考生面对媒体，不仅表达了对于教育和考试的观点，更是借机表达了自己对于各类民生和治安问题的看法，尤其是针对近期愈发尖锐的劳动条件、生活成本、性别权益等议题。本期《高考考生议政——为工人阶级而发声！》指出，这些例子，虽然不能取代更全面的数据和调查，但是它能作为一个切片，向我们证明了青年群体的持续政治化。更重要的是，群众对于这些正义感十足的发声表现出的拥护，则更能说明群众意识的发展。

革命政治报不可能在每个新闻报道和分析中，都完整地展示一张新社会构造的蓝图。在每个场合都以百科全书猛砸群众，并不会使群众突然醒悟。群众是一种物质力量，而他们学习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类舆论事件和切身体会的历史性事件，也就是物质进程的变化。具体性在此处扮演着突出的作用，它寄予我们足够的理论深度，不陷入急躁的迷茫情绪。工人阶级是分不同层次的。危机的蔓延，会使得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广泛的工人群众从事件中醒悟过来，总会有一些层次更鲜活，更有政治觉悟，也更有行动力。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层，革命党首先要力所能及地从这种最有活力的先进层中吸引支持者，建设其组织——在目前，这一层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学生构成。

这些人自然容易接受抽象的理论宣传，但他们更受到具体的鼓动号召所感染。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报，除了进行理论性、蓝图性的宣传，也要也要针对性地对先进层关注的议题，进行具体的、揭露性的鼓动。政治报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将这些热点新闻中彰显的社会矛盾进行最根本的分析，为同志们指出近期舆论攻势

的突破口，帮助同志们接触先进层，与他们一同思辨，将他们吸引进革命党的事业中来。

对于许多人而言，中国革命的任务仿佛像一座高峰一样难以企及，但基于正确理论的分析和事实都不断向我们证明，其中国社会是一座火山。在穹顶、山峦之下，工人群众的愤怒犹如炙热的岩浆在暗流涌动。社会矛盾虽然没有达到质的爆发，但它依然在进行量的积累，并以各类的舆论事件向我们表明其进展。可以说，只有抓准舆论风口，才能切入群众的痛点——要在极端高压的独裁条件下做好宣传、鼓动，就离不开这样的技巧和经验。

台湾问题何去何从?

莫默&洪专

特朗普近日的对华国事访问，给中帝国主义近期的一系列政治作秀提供了最佳的素材。特朗普原本期待自己过去大半年以来的强取豪夺能好好地挫挫中共的锐气，以在此次蓄谋已久的“鸿门宴”上给后者来一记下马威。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冒险的失利之后，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已然完全落空，而习近平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对于中共及其喉舌来说，此次访华最大的焦点之一无疑是中美就台湾问题的磋商。会谈还未结束，官媒就迫不及待地早早发文，声称：

>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很显然，中共想要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群众炫耀：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有着充足的筹码，而特朗普只能低三下四地被习近平“教做人”；长久以来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中国无产阶级也因此应该在这统一“大任”的新进展面前骄傲地挺起胸膛。

从最新海军宣传片《向大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华，中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在加大其宣传力度，对统一台湾的议题大肆声张。习特会上中共关于台湾的作秀本身乃是这一宣传运动最新的一个体现。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共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如此自信，而中共又想借此达成什么？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主要关注的绝不是这些政治作秀的表象。因此，若是想要透彻的理解这一系列现象，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回到其背后的根本，也就是近期中美帝国主义矛盾本身。

伊朗战争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我们过去的分析不断强调，美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是决定近日世界格局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衰落”是什么意思?美帝的相对衰落不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更不意味着它会拱手让出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相反，它会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并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愈加需要对其对手发起或直接、或间接的挑战，带来更多暴力、混乱、与野蛮。

伊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鲁莽的赌博”，并发展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重大战略失败”，因为美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迫使伊朗放弃核武计划、终结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并实现政权更迭。即使在数周战争之后，美国仍无法确保这些目标；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防空系统被消耗、国内政治反弹，都削弱了特朗普在国内外的地位。与特朗普的如意算盘相反，这一仗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美帝期待的是屈服，结果却成了它打不起的消耗战。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是军事上的，即使美国仍然有能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进行全球舰队部署，这证明美国军事力量依然巨大，但正如我们上文所说，它已不能继续可靠地产生华盛顿想要的政治结果。第二是经济上的，伊朗战争越来越多地反弹到世界市场之中，表现为油价上涨(高于50%)以及通货膨胀(美元在四月高达3.8%)，而众多陷入能源危机前景的国家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

国发达的新能源技术和稳定投资。第三是外交上的，特朗普访华表明，华盛顿即便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也必须在伊朗和贸易问题上寻求中国合作。一个霸权国家若必须请求其竞争对手来稳定其自身战争所造成的后果，那么它仍然强大，但其权力已不再具有旧意义上的霸权。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并不把帝国主义仅仅局限为为对外侵略的现象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其特征是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以及大国之间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竞争转化为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现象之一；金融资本则是在垄断条件下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

固然帝国主义会以包括政策和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归根结底，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申，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对于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分析，包括对中共对台湾真实意图的分析，都应该基于这一客观而又具体的方法论之上。

武统、胡萝卜、与大棒

那么，近期中国对台湾种种表态与举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台海战争的前景迫在眉睫？

当然，正如我们上文解释的，其中是存在帝国主义竞争的因素。中美当前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是最直接的对手，而台湾则是中美双方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颗棋子。中美帝国对台湾的任何动作，都可以被双方用来对对方表态和施压，并吹嘘为自己之于对方的又一胜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帝国的对抗最终一定需要表现为某一方对台湾字面意义上的彻底征服呢？我们认为是否定的。虽然针对台湾在外交和媒体攻势上的争夺十分引人注目，但是中帝与美帝帝国主义竞争的擂台却远不止于台湾。美帝相对衰落的一个根本体现，乃是其争夺外部市场，并以此施加其政治影响力的手段，正在被中国严重的威胁。

就比如，在拉丁美洲，中资已经渗渗透进了社会和经济运转的方方面面，而在东盟甚至是欧洲国家之中，其统治阶级也难以抵挡中国投资的诱惑。中国在经济方面有利于美国的杠杆也正在撬动这些地区的政治。阿根廷的米莱虽然与特朗普“亲密无间”，但仍然在贸易与矿产问题上与中帝眉来眼去；向来顺从美国的英国也开始与中国修复关系来稍微平衡于美国。

因此，虽然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相较于美国来说屈指可数，但却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相比之下，早已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对其想要拉拢的外国资产阶级来说，早已没有了诱人的胡萝卜，只剩下军事干预的大棒。但是，伊朗战争中美军的颓势，似乎标志着美帝的大棒也正在和其胡萝卜一样，变成空心的了。

因此，美帝近期的失利给了中帝前所未有的底气。中共必然想要借此耀武扬威：对于其邻国，中共有必要体现，中共不仅有胡萝卜，也有大棒——也就是中共动用强大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一点在最近发布的宣传短片《向大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片炫耀中国海军舰艇方面的军事成就，并把海军发展和台湾问题绑定在了一起。

但是，拥有大棒，不意味着就一定需要真的动用这根大棒。对于中共来说，在台湾和美帝的问题上，与其真的动武，继续施加其经济杠杆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肯定是更加有效，也是更加稳妥的选项。

中国民族主义

那么，中共这一系列宣传造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对中共和中国资产阶级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煽动民族主义。通过把征服台湾呈现为一项神圣的民族事业，中国统治阶级能够把群众的愤怒从资本主义、不平等、压迫、失业和剥削等问题上转移开来。

民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最青睐的维持其统治并安抚无产阶级的手段。在10年代的经济上升期、以及疫情初期之中，中共不断向无产阶级强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并通过对比中国和美西方的发展，试图强化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帝国主义以及中共统治的认同。不得不说，这一举措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自从疫情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危机被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而中国劳苦大众则是最深受其苦的。在经历了疫情后期的各种乱象、经济持续疲软、以及生活质量的持续下降之后，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群众早已对民族主义叙事——以及中共统治本身——失去了信心。中共无法消灭中国帝国主义愈发深重的矛盾与危机，而此时群众的普遍不满情绪则是相当危险的。而美帝近期史无前例的战略失利，则使得中共以为它可以复刻疫情前依托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公众信任。

而在中共的众多民族主义叙事之中，台湾问题又是中共最有力且最有效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台湾的民族主义成为欺骗、迷惑中国工人的工具：政府鼓励他们把台湾视为一个叛乱省份，或一个被外国操纵的敌人。而在美帝如此耀武扬威、咄咄逼人（虽然并不成功）的当下，中共便可以再次举起“抵抗外敌”的大旗，呼吁群众暂时忽视眼下的不满与困境。结合中共在几乎同一时间所发表的（相当愚蠢的）反对“境外势力呼吁躺平”的宣传，可以看出中共是相当重视利用美帝近期举动，并指望其能够对群众意识起到（对中共来说）有利的作用的。

关于“统一”

与民族主义相反，我们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际主义。但什么是国际主义?其关键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否自称社会主义，而是它是否捍卫被压迫民族或独特民族的民主权利，并促进跨民族的工人团结。腐蚀工人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力量利用民族主义来“分裂工人”，削弱阶级斗争。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须清晰地看穿并反对中共的任何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无论是粗暴的沙文主义，还是披着文化、统一或民族权利外衣的更精致形式。因此，我们反对中共对台湾人民民主权利的文攻武吓，同时呼吁中国和台湾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台湾资本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

我们固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我们也同样反对中共利用反对美帝情绪来为中国帝国主义辩护。台湾问题正是中共及其拥护者那庸俗的“反帝国主义”论调崩溃的地方。中国看到了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削弱，并随之在台湾附近部署更多海军舰艇。如果

中国试图以武力“统一”台湾，那么这种行动将是一场帝国主义侵略，即使美帝显然也虚伪地利用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主权议题来服务自身目的。

中共一切所谓“统一”的宣传口号事实上是在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台湾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拥有自己的法律、武装力量、政治制度。此外，一种独立于中国的台湾身份认同已经通过漫长历史发展出来，以及由于中国沙文主义，尤其是挥舞着它的独裁中共制度，日益加深的疏离。

因此，如果中共通过战争、封锁或军事占领来强加统一，这种行为就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它将是吞并；它将把台湾人民的实际意志从属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战略需要。为了更广泛地理解“联合”或“统一”的问题，必须作出一个区分：工人民主的联合以无产阶级本身的独立与自由为前提，而帝国主义的吞并本身则是在破坏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权力。以武力或占领强加的“统一”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行径，而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无产阶级不应该对这种行径给予一丝一毫的支持。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

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必须拒绝另一种幻想：即美帝国主义是台湾解放的保障者。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援引，并不是出于对台湾工人的关心，而是为了把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杠杆。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首先是在地理、经济，尤其是军事上围堵中国的战略手段——这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主与民生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无关紧要。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也证实了这一点：台湾统治阶级对于自己何去何从没有任何话语权，台湾的政策与主权不过是中美更大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我们绝不可以在击败台湾和美帝统治阶级的任务上指望中帝国主义者，这一任务只有台湾和美国的革命者以及无产阶级才可以完成。而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我们也必须清晰自己的立场和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当下，我们必须指明：中共的对台政策不会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一丝一毫的利益。中共强调“统一”，但这一口号实则统一起来的是中国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使得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镇压中国无产阶级；而假如

未来台海发生武力升级，事实上受益的也只会是那些官僚权贵，而无产阶级能够收获的也只有苦难与死亡。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中国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自身最大的敌人，而打倒这一敌人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帝国主义在中东

布龙施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影响力经历了缓慢但难以逆转的衰落。与其实力上的衰落相对应的，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的入侵以及其对以色列帝国主义的长期支持，也令其在中东各国群众中的威望迅速下滑，并且在2023年的加沙战争后跌落至冰点。

与之相对的，中国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则在过去的一个时期稳步上升，越发积极地介入地区局势。在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一对互相冲突的次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和解，随后又促成了巴勒斯坦各政治力量在北京的谈判。

中国帝国主义这些活动的动机是什么？它将起到怎样的影响？它会取代美帝国主义吗？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不仅是理论上必要的，更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责任。

中国的布局与局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中国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布局的基本情况。

从贸易上看，中国是中东尤其是几乎所有波斯海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贸易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中国从海湾进口能源及矿产，前者则向后者出口制成品的模式。

目前仅中国一国便吸收了海湾所有石油出口的四分之一，且可能仍有上涨空间。对于伊朗来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占据了其全部石油出口的95%以上，并且直接贡献了伊朗45%的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从波斯湾地区进口的石油也占据中国石油进口的接近一半，可以说中国和海湾国家的贸易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在投资方面，中国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在迅速扩张，2024年，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资目的地。此外，在2021年，中国还承诺在未来25年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这基本上是伊朗所能获得的全部外部投资。

但如果仅就此而言，就认为中帝能够在这一地区产生真正决定性的影响，则又未免夸大。

就投资存量而言，中国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的资产存量仍不足该国外国资产总量的5%，是欧洲的不到十分之一。而贸易方面，中国虽然是重要的贸易对象，但中国的廉价工业品倾销又对海湾国家正着力推进的产业多元化产生威胁，因而这一地区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并且在中国国内能源转型，以及中国政府试图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的背景下，中国和海湾的石油贸易本身的前景也面临挑战。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军事投射能力，相反，中国在中东的投资更经常需要美国所提供的安全环境。具体来看，在过去几年间，中国被迫坐视沙特和阿联酋的企业在美国施压下中断和中国企业在AI方面的合作，甚至中国对伊朗承诺的投资也基本上由于美国施加的制裁处在停摆状态中。

美帝衰落、地区强权抬头

这种矛盾实际上说明，中国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外交中的活跃姿态，并不只是因为中国帝国主义本身的力量增长。以沙伊和解为例，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沙特阿拉伯自身不希望和伊朗进行和解，中国绝没有能力强迫二者接近。因此，该地区的外交变化主要仍应该从美帝国主义的衰落及当地地区性帝国主义的抬头来分析。

在二战后，海湾石油国家普遍被美帝国主义纳入势力范围，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并用美元购买其石油。这些石油国家随即用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投资美国资产。由此建立了海湾君主国和美国之间稳固的同盟关系。

然而这种关系在2010年代遭遇了深刻的挑战。

一方面，在页岩油革命后美国自身成了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和海湾各国的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化为竞争。另一方面，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的表现也让海湾国家开始质疑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能力和信誉。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施加的金融和能源出口制裁，让海湾各国开始将对于美元和美国的依赖视为一种潜在的风险，进而试图引入其他大国来进行对冲。

在贸易战开始后，美国试图重新加强对盟友的控制，并动员盟友加入对中国的围堵，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海湾各国疏远美国的进程。

出于对海湾各国和中国经济外交联系的担忧，美国一方面收紧关键技术和武器对海湾的出口，例如限制沙特购买先进芯片、F35战斗机、先进无人机等，一方面又施压海湾国家让其取消与中国在AI、芯片、军工方面的合作。这实际上反而迫使海湾国家进一步拉拢中国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并避免完全倒向美国阵营影响其对华贸易关系。

例如，通过购买中国无人机、核技术，沙特反而迫使美国放开在这些领域对沙特的限制与中国争夺影响力。沙特和伊朗的谈判长期通过伊拉克和阿曼作为中介，在最后阶段却引入中国，很大可能也是为了限制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对。

中帝的渗透和挑拨

中帝也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新地位。这也同样是由于美国试图施压地区盟友围堵中国，而中国出于对海湾地区能源、矿产和交通线的依赖，必须避免该地区真正形成针对中国的敌对联盟。因此，在中东缺乏和美帝对等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的情况下，

中国帝国主义自然乐于利用甚至主动扩大美国盟友和美国间的嫌隙，从中谋取战略空间。

然而这样的机会主义策略自然也有其极限。归根到底，中国资本能够在混乱的形势下自由地投资中东，仍是因为美帝的军事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秩序。然而，当今美帝逐渐丧失其地区霸权，各地区强权展开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脱离美国控制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帝国主义要试图和沙特、阿联酋、伊朗、土耳其乃至以色列等所有地区帝国主义全部保持友好接触的政策，必然因地区冲突加剧受到挑战。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帝仍将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让自己的经济利益面临威胁，要么在实力不如美帝的情况下直接卷入地区冲突，进而彻底在中东的群众面前暴露自己。

当然共产主义者没有水晶球，不能对此做武断的预测。但我们目前可以明确的是，美帝国主义对海湾疯狂的干涉，中国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逐渐渗透和幕后挑拨，以及地区性帝国主义在此背景下的互相争斗，给中东带来的绝不是多极化爱好者鼓吹的和平发展，而只能是更多的战争和贫困。在根本上，中东的无产阶级绝不能对中国帝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能够终结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的蹂躏的，只有一场跨越国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革命。

热浪来袭，汛期已至，荒漠洪水：气候危机出路何在?

墨黎宣

六月刚刚开始，全国多地已经进入酷暑。走在街头的人能明显感受到，今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加炎热。

事实上，这并不是人们的错觉。中国气象局近期报道显示，今年中国夏天也预计平均气温也将高于常年0.6摄氏度，同时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

对于青年以及无产阶级来说，高温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建筑工人不得不在烈日暴晒下继续施工，外卖员和快递员依然要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无法因为高温而停下机器。

闷热的空气让人头昏脑涨，汗水不断流进眼睛，衣服一次又一次被浸透。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不仅会让人疲惫不堪，更可能导致脱水、中暑甚至危及生命。注意力下降、体力透支和精神紧绷，又进一步增加了工伤事故发生的风险。许多劳动者白天在烈日下苦撑，夜晚又因为持续高温难以休息，身体和精神都在被一点点榨干。

然而，资本家不会因为高温而停止追逐利润，工厂不会因为热浪而停止运转，平台也不会因为烈日而停止派单。工人们只能继续顶着高温工作，用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去换取微薄的工资，用自己的身体承担这场愈发严酷的气候危机所带来的代价。

失控的高温

被迫面临酷暑的不仅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在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今年5月连续一周气温维持在47度到48度之间。与此同时，拉贾斯坦邦、中央邦、旁遮普邦等多个地区温度也接连出现45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欧洲同样未能幸免。法国、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相继遭遇异常高温天气。

从亚洲到欧洲，极端高温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这表明气候危机早已不是局部地区的问题，而是一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全球性危机。

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形成。这会导致赤道海域面积气温上升，加剧全球气候不稳定。据联合国气象组织报道称，接下来5年中全球气候预期将会升温1.5摄氏度。

然而，这场危机并非凭空出现。过去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张生产规模，掠夺自然资源。森林被大规模砍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被无节制地燃烧，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环境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仓库，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不断推向极限。

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推动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并逐渐破坏维系人类社会的气候稳定机制。

洪水来临

但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而言，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仅仅是高温本身。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越来越炎热的空气正在为更剧烈的降雨积蓄能量。热浪、暴雨、洪水和泥石流，各种自然灾害和气候危机将接踵而至。全国各地的高温同时也带来了汛期的预警。

在今年5月，江西、安徽等多个省份遭遇持续强降雨，洪涝、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接连发生，造成至少21人伤亡。进入6月后，中国已全面进入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南方、西南地区以及部分北方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增多，长江中游的部分河流以及珠江流域的部分存在发生洪水和特大暴雨的风险。甚至连新疆这样常年干旱的沙漠地带，都因升温导致冰雪融化量升高，将面临着极端洪水的威胁。

对于广大劳动群体而言，这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景象。过去几年间，每到汛期，大规模洪灾、山洪和泥石流便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无数家庭失去家园，大量群众被迫转移安置，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作为一个长期以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自我标榜的国家，中国近年来却屡屡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冲击。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中共多年来宣称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政策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当洪水冲毁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家园时，中共真的能够保护他们吗？

中共有能力应对自然灾害吗?

从过去数年的情况来看，每逢汛期，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中国应急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仅2025年上半年，自然灾害便造成307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41亿元。

然而，在这些天灾的背后，人祸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政府部门的准备不足、预警失灵以及应急处置不当，往往会进一步扩大灾害造成的损失。2025年7年，北京遭遇严重暴雨和山洪灾害。事后官方调查和公开表态均承认，当地在防汛准备、风险研判和应急响应方面存在不足。最终灾害造成30人死亡，超过8万人被紧急转移。事实证明，即便掌握着庞大的行政资源，中共官僚体系在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时，依然暴露出明显的治理短板。

不仅如此，中共在灾后重建方面的表现同样令人质疑。以2023年京津冀洪灾为例，为保护北京及下游重点区域，河北多个蓄滞洪区被启用，近百万人被迫转移，大量农田、养殖场和居民住宅被洪水淹没。然而灾后补偿、损失认定和重建工作长期引发争议，不少受灾群众对补偿标准和恢复进度表示不满。

与此同时，灾害本身也在不断推高重建成本。仅2025年的洪灾就波及23个省级行政区，造成超过160亿元的道路基础设施损失。在地方政府债务持续累积、财政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未来究竟还能投入多少资源用于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其能力显然要被打上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生存还是毁灭?

气候危机是一场关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而在当今世界，这场危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被加剧和深化。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并非满足人类需求，而是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正因如此，资产阶级既不真正关心环境问题，也不在乎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处境。只要这个制度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利润，他们便不会在意人类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即使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整个文明的存续，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榨取自然资源和劳动者以换取更多财富。

当无产阶级被迫顶着烈日劳作的时候，许多资本家甚至连本应发放的高温津贴都不愿承担；当洪水、热浪和干旱接连袭来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也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如何维持利润和资产价值。

然而，气候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会被社会中的所有人平均承担。极端天气不会让资本家失去逃离灾区的能力，却会让无数劳动群众在灾难中艰难求生。当自然环境的危机席卷而来时，资产阶级拥有金钱、保险、医疗资源和更安全的居住条件来抵御风险，而无产阶级往往只能独自承担灾难最沉重的后果。

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理人的中共波拿巴官僚集团，同样不会真正关心广大群众的命运。长期服务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早已习惯用金钱和价值的尺度衡量一切。在他们眼中，生态保护与气候治理并非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而是为了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他们口口声声宣传“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却容许房地产开发破坏森林与土壤，增加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风险；他们高谈阔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却对污染排放、生态破坏和资源掠夺长期采取纵容态度。

因此，气候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只要这个以利润为中心、以无限积累为目标的制度继续存在，气候危机就会不断恶化，并最终威胁整个人类社会，乃至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存续。

对于广大的劳动群众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只有建立建立在科学规划和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摆脱利润逻辑对生产活动的支配。通过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人类才能合理安排生产与资源分配，重新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平衡；才能全面发展清洁能源、减少资源浪费、运用科学技术缓解乃至逆转气候变化趋势。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避免生态崩溃和文明毁灭的结局。

气候危机从一开始就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废除了资本主义便自动消失。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人类共同利益而非利润积累为基础的新社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拥有属于全人类的未来。

高考考生议政——为工人阶级而发声！

思多葛

近期，全国高考落下了帷幕。踏出代表着12年刑期的高考考场，许多考生大胆地喊出了无数饱受欺压的劳动者和青年人的心声：我们不想要放假调休、无底线的加班，更不想要被性侵害，我们要涨工资、降物价——我们要过好日子！

青少年为工人阶级而呐喊

2026年6月7日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依照新闻界传统，首日结束后，许多地方报记者前去各地高中采访学生。一些学生便借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直接表达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

陕西都市快报报道，一位考生表示能不能取消政府征收的“机建燃油费”。近期政府开始渐进推行紧缩政策，一系列公共服务开始涨价，伊朗战争则进一步影响了油价。因此机建燃油费从5月开始大幅增长，直逼一些国内航班机票的价格。国内群众已经开始感觉无法忍受，而这位考生则一语惊人，道出了群众无处可说的不满。

同天，另两位考生喊话希望（国家）“取消调休”，希望（企业）“遵守劳动法、维持5天8小时工作制、给足加班费、并为劳动者支付社保”。这些例子向我们说明了青年人的阶级意识是如

此之清晰，除开对自己的未来就业前景的担忧，他们完全了解劳动阶级的受压迫和剥削之深重，且渴望为其而发声抗争！

女孩勇敢呼吁提高性同意年龄

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反映在阶级矛盾加剧，也反映为社会文明程度的倒退和治安不稳。近年来，中国犯罪率也有所上升，性侵未成年的现象也日益猖獗，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4.3万人，年均上升5.4%。然而在司法实践上，中国的法定性同意年龄仅为14岁。大量14-18岁之间学龄女生依然有风险遭到危害，其中官僚或教师利用师生关系诱奸女生的情况层出不穷，尤其令劳苦大众深恶痛绝。

这使得广大工人阶级（尤其是女性）感到不安。这时，一位女考生的喊话就显得尤为切中要害，指出体制的弊病和社会的衰败。在采访中，她呼吁国家提高法定性同意年龄到18岁。要知道今日中国的法定性同意年龄，是低得可怕的14岁！这是为居心不良之人大开后门！当国家在纵容反动的厌女思想大肆传播时，许多网友则纷纷表示支持这位考生。大多数人是认识到，“这个提议对正常人有零个坏处”。任何正常成年人都不会想要同18岁以下的女孩发生性关系，同样18岁左右的女孩也正在自己说不要18岁以下的“性自由”——那么反对这项提议之人的心思昭然若揭。

更深一层，群众的心理其实指向了质疑体制的反建制情绪抬头。广大网友们对于这种健康的反性别压迫的防御性倡议的支持，说明大多数工人阶级都认识到了，当今的国家法律、教育资源与工人道德、女性地位实际上存在很大冲突。性同意年龄具体是否设置为18岁不是重点，重点是青年和群众已经籍由性别问题发展出了进步的反建制意识。我们要朝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方向推动这种进步意识：事实上，必须要有健康全面的全民性教育才能保护我们的青少年，但只由我们工人阶级民主地掌管生产、教育和政府，才能获得推行性教育的资源，让法律反映社会真正的诉求，而这些都必须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成——否则，群众响应呼声再强烈，但统治阶级反而进一步捂嘴！

青年的阶级意识、质疑当局的反建制情绪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这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陷入紧张。他们很快将这一系列原采访视频下架，进行了小规模的禁言处理，同时不成比例地在知乎等平台纵容反动和厌女的评论，作为辅助的打压手段。当局如此的敏感，让群众更加侧目，有网友讥讽到：“一个女孩的合理建议，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何为要遭到捂嘴？”而当有人要人肉这位女生，B站一个视频下众多网友纷纷说：“不用找了，我就是她，我们就是她。”

青年和群众正在向左转

在专制政权之下，劳苦大众是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的。然而，群众的心声总是会寻找各种场合吐露出来，尤其是勇敢和对社会问题最敏感的青年人。

高考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往往是国家宽容对待青年异常举动的可贵契机。事实上，高考生利用这个契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举动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在2024年，也出现过各地考生示威支援巴勒斯坦的举动。

我们常说青年是阶级矛盾的晴雨表。作为预备役的工人，才刚刚踏出高中校门的青年已经对于未来自己需要面对的劳动条件和受压迫前景、以及更重要的社会普遍问题表现出如此多的不满，这是青年人想抗争敢担当的可贵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如此深重。广大群众在网上的对学生们号召的广泛呼应、对当局打压的阴阳怪气，侧面说明了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建制广泛的阶级愤怒。

正是危机时代刺激着人们去改造世界，寻找革命的思想，而恰逢其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无可阻挡的。青年人是社会的希望，必须将他们的正义引导到正确的革命纲领上。群众正在越发激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为我们的事业怀揣着乐观的态度！

论“混的人”和“崩老头”：青年人往何处去?

帕里斯·蒙克

> “那些文学描写中的贵族和他们在平民阶层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当做人们童年生活的典型大加宣扬。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看到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景象：黯淡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人。命运总是欺负弱者，有谁还会比儿童更加弱小呢？
>
>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近来，“混的人”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热词。广大群众都关注到了这样一群青年——他们初高中辍学，在城市中过着收入不稳定的贫困生活（“混”）。除此之外，他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亚文化与身份，包括特定的发型、显眼的名牌服饰以及张扬的行为。尽管与过去的“精神小伙”有些许外表上的差别，但他们在阶级社会下的命运轨迹却格外相似——经过青少年时期数年打零工和游荡在街头巷尾的生活后，他们要么沦落为生活十分贫穷的工人、要么在赤贫中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彻底成为浪人无产者。

辍学青年一直存在，但近期涌现的大批“混的人”却格外刺眼。中共政府更是告诉我们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辍学已

经成为了过去式。可在这个“稳中向好”的时代，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新一代中走上如此晦暗的道路的人却只增不减？为了理解为什么青少年们正在选择辍学去混，我们需要深究整个社会对中国少青年教育和帮助的真实情况。

没有未来的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和整体社会生活的极度不平衡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微薄的工资以及严苛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落户。于是尽管是大量农民工奠基了中国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飞速发展，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他们的子女也只能留守在农村地区长大。

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教育支出在农村严重不足，普通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在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差距约9倍。不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真正能跻身高等教育、并以此进入技术工人行列的学生少之又少。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造成的强烈孤独感更是让青少年艰苦的学习变得不堪忍受。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研究表明，中国74%的农村学生显示出高风险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城市学生的近13倍。家庭贫困使得情况雪上加霜，对于农民工的后代来说，较早的开始工作获得收入明显是比激烈而无望的学业竞争更好的选择。

而被奉为高峰教育竞争激烈问题解药的职业教育学校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问题。尽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可政府教育支出却只有本科教育的大约37%。这迫使哪怕公立的职业教育学校也需以盈利维持生存，职校的学生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学校赚钱的工具，被学校以“实习”的名义送到工厂中承受超额剥削。

“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400万中职学生被要求完成每天10到12小时的“实习”，薪水远低于实习所在工厂的雇佣工人并毫无工伤安全保障。对于不发达地区和贫困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来说，比起花钱被剥削，辍学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而哪怕完成了高等教育，60%

以上的中国应届生实际到手月薪只在4000到6000元之间，只能在城市中勉强维持生计。

学习的艰辛、学校官僚的专横，和忍受这一切后微薄的薪水（更不用说只有大约一半的青年能找到工作）无疑令一条“正常”成为工人的道路毫无希望可言。为了逃离这一切，这些绝望的青年最本能的反映是立刻离开正在将鲜活的生命从他们中抽走的学校。

辍学又能如何生存?

在离开学校之后，青少年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很快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不是一个比学校更好的地方。学校中艰苦的学习和刻骨的孤独，只是广大工人阶级在流水线上消磨的余生的预演。而随着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血汗工厂的超额剥削，试图找到任何替代它的维生方式。而对于社会经验较少、格外渴望经济独立、又对未来毫无期望的青少年来说，任何快速获得金钱的手段都格外诱人。（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在瑞典甚至有十三四岁的少年被黑帮雇佣为职业杀手。）打零工，认老大，搭帮结伙和通过各种捷径赚快钱的行为自然在辍学混少年的群体中找到了土壤。

以现在格外猎奇的崩老头为例，它就这样成为了许多“混的人”快速获取金钱的手段。“崩老头”指的是通过网络情感陪伴索取金钱，“崩”的人一般包括“精神小妹”、伪装成“精神小妹”的“精神小伙”、和产业化的利用或欺骗辍学青少年“崩老头”团伙。被“崩”的对象一般是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他们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精力社交，于是互联网上默认通过金钱购买陪聊就成为了一种异化的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大部分“老头”都意识到自己被崩）

对于资本家来说，“崩老头”也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崩老头”平台公司很快开始垄断“混的人”和“老头”之间的联系，就如同外卖平台垄断骑手和顾客的联系渠道一般。“混的人”又成为了“崩老头”流水线上的计件制劳工，被平台抽走了大部分的收入。他们想要通过“混”来逃离的血汗工厂竟然在

他们的谋生手段中再次出现，这难道不正宣示着他们不可能通过辍学和“混”真正逃离窒息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往何处去?

中共官僚用惯常的高高在上与虚伪指责“混的人”和“崩老头”：网信办声称这些现象来自于青年“不劳而获的心态、攀比的虚荣心”。可谁又能比吸血的资本家和官僚们更加不劳而获呢？谁又能比用奢侈品、豪宅装点自己的他们更加虚荣呢？那些批量生产出爱泼斯坦和赵富强之流的人间魔鬼又怎有权指责他人的堕落？当统治阶级已经肆无忌惮地犯下最骇人的事件——种族灭绝、强奸未成年人、集中营，并将其视作与生俱来的权利时，那么还有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吗?

这些青年境况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的腐朽与衰落，以及死死抓住这个旧世界贪婪地攫取着金钱与权力的资本家和官僚们。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短暂的二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迅猛的发展使它勉强可以为大部分的青年提供就业。可生产力的发展终究会遭遇生产关系的局限，生产过剩的矛盾不断累积，资本主义重建初期的高速发展迎来了它的反面——疫情以来持续的资本主义有机危机让大部分工人和青年都丧失了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消沉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促使着许多生命才刚刚开始的青年走向无处可去，但能短暂带来自由幻影的“混”。

大部分人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情绪注视着这群绝望又迷茫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何尝不折射着如今工人阶级普遍的情绪呢？这种不满情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出来，从辍学到躺平种种现象都反映出了无产阶级对体制的质疑和抵触。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种相反的情绪也在年轻人中酝酿——从最近的高考考生大胆提出政治诉求到频繁的学生抗议，我们看到青年无产阶级不仅仅在消极的抵抗旧社会，更是在积极的探索通往新社会的道路。

青年人所面对的问题，从就业、教育的失败乃至整体社会的无望，在资本主义下并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有工人民主计划的经济才能用优质、自由的免费教育取代以利润为导向的填鸭式教育，能降低整体工作时间但大幅提高工资，将所有人吸纳入就业之中。让人人都享有完整的、有尊严的生活，而不需要成为“混的人”来逃避这个腐朽的社会——这就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广西地震：天灾还是人祸?

Kim K

2026年5月17日至5月24日，广西柳州大大小小地震了61次，最高5.2级，并伴随多次余震。此次地震造成的灾害程度，在广西是近些年来最严重的。截止2026年5月20日的消息，一共有2人遇难，1人失联，5人受伤。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了58栋房屋不同程度的损伤，并有次生灾害例如山体落石等其他报告。除此之外，更有大量居民无家可归，全城恐慌。据官方统计，后来有近万人被安置转移。地震后，柳州人民还面临着大洪水的问题，柳江河正值汛期，又迎来大暴雨，洪峰过境水位达81米，不仅居民楼一楼二楼都被泡在水中，地震受灾后的安置帐篷也面临着洪水和余震的双重考验。

天灾还是人祸?

广西位于华南地块内部，虽然远离全球主要地震带，但这块区域也存在中小型断裂带。广西处于喀斯特地貌结构地区，地下布满了溶洞和地下暗河，也就是说广西的地貌是中空的。并且这次地震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4—8千米。地震释放的能力没有经过岩层缓冲，而直接传导表面。也就是说源越浅，地震能量损害越少，所以也越强烈。而溶洞中空的结构有放大地震波的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威力，所以出现了很多地方路面坍塌等情况。

对比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带之一的台湾，平均每年可以记录到数万次地震（绝大多数人体无感），并几乎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6级以上地震。台湾有时会出现7级的地震，却仍没有出现广西这般的同比例建筑摧毁的情况，除开自然因素，这是为什么呢？

广西并非地震带，上次可记录的到的大型地震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95年2月15日）。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看似不会露馅的偷工减料的机会。

据网友所说，大学教学楼出现了开裂的情况。按照中国建筑设计的抗震标准，抗震设防烈度应为7度，而医院和学校等重点建筑的防震结构必须要达到能防御8级以下的地震才算合格。很显然，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自行其以为是地批准了这些建筑规划，他们的小聪明估计也确实填满了他们的腰包。

而当灾难真的降临，是真正使用这些建筑的劳苦大众替他们付出了代价。例如，据网友所说，柳州某小区竟全是预制板房，在这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地震中，小区楼房竟然广泛出现了较深较大的裂痕。

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之闻名，居民们都不敢多想自己房屋的构建是否值得信任，这也就代表着对资本家是否会偷工减料与中共管理的长期质疑和不满。开发商为了利润最大化，会不断压缩成本：钢筋少一点、水泥差一点、防震标准降一点。施工层层转包，监管流于形式，而真正承担风险的，却是无产阶级。

此外，在基建如此强大的中国，充盈的住房资源却无法被广大真正有住房需求的劳苦大众所享用。郊区、农村的居民只能住在自己搭建的自建楼里，而自建楼考虑抗震需求的少之又少，甚至一些更为贫穷的地方只使用砖瓦造房，而非强度更高的钢筋混凝土。

于是非常多的自建房（甚至是商品房居民楼）都没有进行或很少进行抗震结构的建立与测试，于是就在这场只有5.2级的地震中，自建房大规模倒塌，居民楼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严重的裂痕。

如果由工人阶级控制生产，那么我们不会有豆腐渣工程，也不会因缺少住房而倒逼居民自己建造有隐患的房屋。但因为资本主义的偷工减料和其造成的贫穷，仅5.2级的地震便能杀伤巨大。

没有保障的劳苦大众

再者就是地震后的恐慌，家没了，居民们何去何从。目前政府有条件收容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一些旅店学校宿舍公租房或者帐篷内，并且在安置点无偿提供一个月食宿。

但之后呢？谁来承担修复住房的成本呢？若居民楼商品房的修复可以由政府和房地产企业承担，那由居民自建的房屋的修缮和重建又由谁来负责？楼房的重建与修复，又要多久？这是所有人都不得而知的，但肯定不止一个月。再者，很多自建房都是一楼小商铺，二三楼住人的模式。举例来说，广西的支柱产业之一为桑蚕养殖，很多农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业。一般为一楼作为销售蚕丝的商铺，二三楼不仅住人，也会在空地养蚕。

房屋一倒，村民不仅失去了住所，更是直接断送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除此之外，城市里的居民目睹着墙上触目惊心的裂缝，是否还敢居住在危楼内。若离开，微薄的工资又能支撑他们去往何处。所以，此时居民们将如何生活，会不会像当时疫情期间自费隔离一样，需要自费安置？那么无产阶级又何以为生？

中国作为一个波拿巴政权国家，确实能在灾害上反应迅速，在短时间内集合大量人力资源进行抗震救灾，但对于已经蒙受了灾难苦果的劳苦大众来说，这无非是亡羊补牢。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是靠每天打工维持生存的，而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又十分依赖他们那日复一日的生计。一旦失去能够稳定休息的住所、失去工作场所，生活链条会迅速断裂。当灾难摧毁他们赖以维持生计和日常生活的条件时，他们立刻就会陷入困境。

而资产阶级呢？网友切实拍到豪华小区的居民早早在第一次地震后就收拾东西离开柳州。对比起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当然能够负担起灾难时出行住宿的成本。这场灾难的关键从不在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什么放大了自然灾害的杀伤力，以及不同阶级在这场灾难中不同的归宿。

中国无产阶级该何去何从？

中国作为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国家之一，对自然已有如此大的掌控力，社会中有着巨量的财富，却还因5.2级地震使得房屋受损倒塌，居民流离失所。自然虽然创造了灾难，但却是不平等决定了谁更容易成为灾难的受害者。同时它也是一面放大镜，它揭示了中国可怕的贫富差距、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漠不关心，也让广大的无产阶级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丑恶。

为何生产力已经如此发达，却依旧没有办法保障人民最基本的安全居住环境？

为何无产阶级创造了整个社会，却在灾难面前首当其冲，并被迫流离失所？

为何建筑、土地、住房这些关系到劳苦大众生存的基本要素，却被资本主义的利益所支配？

因为我们工人阶级及其他劳苦大众生产了一切，但生产资料不在我们手中，社会生产不为我们的切实需求服务，却在为老板增加利益。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永远不在这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之内。

我们要安全，我们要生产资料，我们要工人民主，我们要工人控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我们要社会主义！

短评：“社会就不该给你们工作！”——巨婴资本家和沉默的青年人

墨黎宣

当粉笔CEO张小龙先生满怀期待地走进人大的考公讲座，迫不及待地想要炫耀自己最近炒美股赚到5300万元，结果却失望地发现这里的学生居然只想着为了谋生而勤勉考公！他们居然对自己这个大老板赚到了多少钱毫不感冒！

多么的震惊与失望！这位气急败坏的CEO不愿接受自己的成功没有得到相应的掌声，于是公然开始辱骂自己的听众。一个身家不菲、拥有企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的资本家，站在大学讲台上，面对即将毕业的年轻人，居高临下地宣布“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辱骂他们只知道“混吃等死”。同时，他毫不遮掩自己的阶级优越感：“我的资产比你们多”，“我就是来炫富的”。

傲慢、自大且易怒！换句话说，一个可笑的巨婴！这便是张小龙个人的特点。但当张小龙站在讲台上，对大学生说出“活该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之类的话时，他显然在分享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真实的想法。

资产阶级觉得自己赚了钱，所以他们的人生经验值得被学习、崇拜；他们当前获得了“成功”，所以他们的话应该被认真聆

听；他们站在讲台上，所以台下的人理应鼓掌。一句话，他们比那些辛苦打工谋生的人优越！

资产阶级的傲慢一展无遗。他们沉溺于快速累计的财富之中，工人阶级只是他们剥削致富的原材料，他们自然目中无人。他们将财富视作自我价值的实现、视为永恒的骄傲和自我优越的证明。在过去几十年里，向张小龙这样的企业家被中国大力宣传为时代英雄，是财富的创造者，而他们的成功和声誉，似乎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资本逐利的本性被完全展开。只要能够赚钱，像张小龙这样的资本家并不在乎手段。哪怕是金融投资这样完全不创造任何价值、纯粹的投机性的活动，只要能够赚钱，也会被视为引以为傲。可笑的是，在中美对抗、习近平大力提倡提升中国工业来捍卫中国资本主义时，张小龙还在傻乎乎地高调强调要投美股，并要所有人去投美股。这种愚昧真是贻笑大方。

短视、贪婪且无知！面对张小龙的大放厥词，学生以沉默回应。1270万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剩下3000多万的在读生看到的不是炒股神话，而是房价；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就业困难；不是上升通道，而是竞争内卷。他们的沉默不是顺从，而是冷眼和鄙夷，心里满是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嘲讽。

当一个企业家在台上大谈自己如何透过资本市场的投机与套利赚取暴利时，学生感受到的不是激励，而是一种名为阶级，令人触不可及的距离。一个依靠炒股赚五千万的人，和为实习、考研、考公焦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

学生的冷淡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恰恰相反，他们太懂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拥有八千万本金。他们知道大多数家庭几代人的积蓄都达不到这个数字。阶级之间的水火不容，正在他们的脑海中轰隆作响。

张小龙把考公和追求稳定称为“混吃等死”。可是这些年，年轻人看到的是什么？是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是上了班之后无休止的加班，是职业寿命不断缩短，是一个个关于猝死和裁员的新闻。于是有网友反问：

“如果不混吃等死，难道猝死吗？”

当一辈子的艰辛都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甚至无法确保自己下一个月是否能吃上一口饭时，所有关于奋斗、拼搏的口号都成为了被老板当作耗材的借口罢了。

绝大多数人考公原因无非是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可以规划的未来，一个不必时刻担心失业的人生。

可是这样的将来在资本主义下是可能的吗？即便是考公也无法再带来一个稳定的将来。如今政府财务压力正在增大，编制也在收紧，同时各地公务员遭到欠薪的事件层出不穷。即使是成功融入到中共官僚体系中最下层也不能保护青年人免受资本主义危机的打击。

工人阶级永远没有办法在一个以剥削他们血肉而维持的系统中找到一天的安宁。今天资本家敢骑在我们无产阶级头上去羞辱，只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无产阶级翻天覆地的力量。他们的财富，都是从我们这里盗取的！在资本主义下，劳苦大众没有将来，工人阶级有且只有一个将来，那就是社会主义。

国际特稿：以色列控制着美国吗?

Ben Curry，转自《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纽约时报》宣称，对伊朗的战争并非是在华盛顿策划的，而是在耶路撒冷。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制定了这项计划，随后他在二月份于白宫召开的会议上将计划提交给特朗普及其内阁批准。

四个月过去了，特朗普已经走投无路。美国最初公布的所有战争目标都已被悄悄搁置，他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挽回颜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内塔尼亚胡却另有打算。他的目标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包括扩大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肢解伊朗，以及最重要的是，让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他不断在黎巴嫩挑衅伊朗，试图破坏停火协议，重新挑起战火。

特朗普最近在电话里直接对内塔尼亚胡说：“你他妈疯了，要不是我，你现在还在监狱里。我救了你。现在人人都恨你。人人都恨以色列，都是因为这件事。”

然而，停火协议看起来越来越脆弱。特朗普能够迫使伊朗接受的任何方案，都会被视为他自己的退让。因此，内塔尼亚胡或许会得逞。在伊朗和以色列最近一次交火之后，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向伊朗开火。“我说了算，”他语气生硬地提醒道。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似乎主导了局势，在七个战线上发动战争，而美国却似乎任由其牵着鼻子走。一个拥有3.5亿人口、横跨非洲大陆的国家，正被一个人口不足1000万、面积狭小、远在9000公里之外的小国，引领着走向一条对其自身利益极为不利的道路。

以色列对美国发号施令的这种表象，为反犹阴谋论者提供了绝佳的素材。然而，这种奇特的关系确实需要解释，而事实证明，这种解释远比阴谋论简单得多。

美以关系的起源

美以关系始于战后时期。当时，中东正逐渐成为美国的关键地区，而美国也正在崛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超级大国。

中东为何如此重要？石油无疑是重要因素。到1970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战后时期持续的工业繁荣导致美国对海湾石油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石油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鉴于中东与苏联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席卷该地区的革命动荡，中东成为了冷战的前线。

如今，美国帝国主义与以色列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它们之间一直存在这种关系；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桥头堡垒。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美以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呢？

1948年，在纳克巴事件发生之时，崛起中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取代日渐衰落的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英国主要通过扶植一系列反动君主制国家来维持其统治。以色列的建国对美国来说正合心意——它削弱了英国。因此，杜鲁门总统迅速承认了以色列国。

然而，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并非仅仅削弱大英帝国。它还想接管英国在中东建立的整套势力体系，这意味着要将反动的阿拉伯君主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在这个阶段，美国人小心翼翼，尽力避免对以色列这个通过恐怖主义和种族清洗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表现出过分热情，以防激起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反感。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美国确实支持以色列，但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主要包括西德的赔款和美国犹太资本家的私人援助。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利用群众发动政变，整个地区的阿拉伯反动君主制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其中最先发生的是1952年埃及的自由军官政变。

即使面对新的局面，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也依然采取经验主义的策略。毕竟，埃及国王法鲁克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的傀儡。或许美国人可以与纳赛尔（Nasser）合作？

因此，1956年，当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占领西奈半岛作为回应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愤怒地要求他们撤军。

谁能想象美国总统今天会对以色列采取这样的立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英国和法国会面临这样的要求，但以色列绝对不可能！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后果使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危险之中。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瞒着美国，与法国帝国主义秘密合作，发展了自己的核计划，这绝非偶然。

然而，美国的这项政策很快就出了差错。埃及不再试图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是日益倾向于苏联，并开始从苏联大量获取武器。叙利亚也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随后在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哈希姆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效仿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军官。

美国政策不得不做出调整。20世纪50年代末，总统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将在任何它认为有必要“遏制共产主义”的地方进行干预，而美国也确实在约旦和黎巴嫩进行了干预。

面具被撕下。美国帝国主义公开暴露出其侵略性帝国主义强权的真面目，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它不惜采取军事干预。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问题在于，美国当时正忙于越南战争。美国在中东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有武装的代理人，以便通过他来开展行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肯尼迪于1963年与以色列直接签署了第一份重要的军事协议。

但美以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

以色列先发制人地发动了一次惊人的打击，在埃及空军起飞前就将其彻底摧毁。随后，以色列迅速从约旦手中夺取了西岸地区，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并从埃及手中夺取了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西奈半岛，直至苏伊士运河。

美国统治阶级欣喜若狂。苏联在该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埃及和叙利亚）在一夜之间遭受重创，而美国却还未动一兵一卒。自此以后，资金、武器和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以色列。

自那时起，按通货膨胀调整后，以色列已获得超过33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将其打造成为地区超级大国：一个能够代表美国作战的强大“小斯巴达”。

以色列的军费开支数据生动地描绘了其扭曲的、军事化的经济状况。1967年之前，军费开支一直低于GDP的10%——按大多数标准衡量，这仍然很高。然而，1967年，军费开支飙升至GDP的15%以上，并持续攀升。1975年，军费开支达到GDP的30%以上的峰值，此后直到1986年才降至15%以下。

从1967年到冷战结束的整个时期，以色列都是一个由美元支撑的武装阵地。用美国将军亚历山大·海格的话来说，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永不沉没的美国航空母舰”。

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以色列人已经多次慷慨解囊，回报了美国的恩人。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后续战争——几乎直接导致了纳赛尔于1970年去世后，埃及在萨达特的领导下重新回到美国的势力范围。

在叙利亚，战败也导致了左翼复兴党军官的垮台，并使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右翼势力在1970年上台，阿萨德开始了“开放”（infitah）运动，开启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进程。

难怪以色列如此受其支持者——美国和西方资本家阶级的推崇。

维系两者关系的纽带日益紧密，数量也越来越多。以色列吸引了西方资本投资。如今，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都得益于它与美国军工复合体之间特殊的合作关系，以色列是该复合体的重要合作伙伴。

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确实特殊。以色列不仅是世界上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美国唯一允许其利用军事援助扶持本国军工产业而非购买美国军火的国家。

与此同时，摩萨德成为美国情报体系的关键一环。美国将军约翰·基根曾形容以色列对美国的情报贡献“相当于五个中央情报局”。

在多次战争中，以色列缴获了大量苏联装备和武器，使美国得以在军备竞赛中保持优势。以色列帮助美国获得了苏联的雷达、坦克，甚至战斗机。有一次，摩萨德甚至诱使一名伊拉克飞行员驾驶苏联米格战斗机直接飞向以色列。

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考虑到以色列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贡献及其所获得的价值，它能够如此长久地俘获美国统治阶级的心也就不足为奇了。支持这个小国已经成为两党共同信奉的原则。

其最狂热的支持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美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除了众多犹太裔美国资本家和犹太社区的既得利益集团外，以色列游说团体还包括一个同样强大的福音派基督教锡安主义团体。

他们携手合作，促进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压制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最重要的是，确保华盛顿采取尽可能亲以色列的立场。他们力图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我们必须强调：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崛起并非这种特殊关系的起因，而是其结果。美国统治阶级对以色列的亲近，无需以色列游说集团来解释，正如其对古巴革命的敌意也无需古巴反革命游说集团来解释一样。

但即便从客观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行为显然损害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能从中看到什么？美国统治阶级中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这种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推动下产生的本能，使其即便与以色列的立场出现分歧，也依然与以色列步调一致。然而，凡事皆有其限度。

以色列有自己的利益

以色列统治阶级一直拥有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独立利益。而且，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他们比美国在对抗以色列时期更敢于违抗其美国恩主！

以色列人的桀骜不驯从何而来？以色列统治阶级的算计很简单。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与以色列的关系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以色列要么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要么就失去这种优势。

美国人可能会抱怨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他们可能会暂时停止武器运输，但以色列历届政府都认为，他们最终会站在以色列一边。

因此，以色列统治阶级积极推进自身利益，多次公然违抗美国总统的意愿。这甚至包括公开敌视美国本身，例如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窃取核机密，以及推行超出美国总统意愿的扩张主义议程。

上世纪80年代，里根——即使以美国总统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亲以色列的——对以色列在1981年未经美国事先警告就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核电站感到震惊。1982年以色列开始轰炸贝鲁特时，他又一次为此焦头烂额。

他甚至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当时贝京的部队正向贝鲁特逼近——并指责他犯下了“大屠杀”！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这确实是措辞强硬的言论，直到最近，特朗普才以充满脏话的抨击回应了内塔尼亚胡——当时后者正威胁贝鲁特。这番充满脏话的抨击，才算在言辞激烈程度上超过了里根当年的表态。

然而，里根最终支持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每一项骇人听闻的罪行。不仅如此，他还是巩固美以“特殊关系”最彻底的总统。他定义了全新的、独特的战略和军事伙伴关系，并赋予以色列诸多特权。1985年，当以色列高度扭曲的军事化经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体系崩溃而陷入困境时，里根甚至出手相助，为以色列提供了财政援助。

这就是事情的全貌：

1. 以色列总理们随心所欲；
2. 美国总统抱怨；
3. 以色列如愿以偿。

正如这种独特的“特殊关系”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培养了对以色列的狂热忠诚，这种忠诚早已超越了理性的范畴，它也扭曲了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心理，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正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一直主导着以色列政坛。

操场上那个恶毒的小霸王到处欺负其他孩子，因为他觉得有大恶霸站在他这边。

在一段2001年泄露的视频中，内塔尼亚胡得意洋洋地向记者解释了他是如何破坏奥斯陆协议的。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激怒美国人时，他回答说：“我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人。美国是一个可以轻易说服的东西。”

以色列统治阶级意识到，他们背后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全部力量支持，他们已经习惯于像打开水龙头一样打开和关闭这种支持。

美国统治阶级的心理

然而，或许关键问题在于：美国确实有意将以色列打造成一个类似斯巴达的小国。但冷战已经结束。与此同时，随着页岩油产业的发展，美国远非依赖海湾石油的国家，如今反而已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

美国的利益已经转移。那么，为什么美国统治阶级还没有随之改变？他们对以色列的迷恋仍在继续。

阶级意识的形成并非与历史事件同步发展。而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则是在长达八十年的不受约束的统治下，才逐渐塑造成如今的模样。

美国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自由派民主党人——在根本上持有一致的观点。一方认为，不受约束的美国力量会带来“安全”和“繁荣”；另一方则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护世界的“规则秩序”。

两者本质相同：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在世界各地展现自身实力；美国可以而且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霸权地位。这几乎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后现代式的世界观——只要美国想要，它就能够得到。问题只在于意志是否坚定，至于现实如何，则根本无关紧要！

这些人才是真正发号施令的人，他们现在正与以色列沆瀣一气，企图破坏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尽管这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以色列是他们可靠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累赘。

特朗普也活在过去。以伊朗为例。在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哪个美国公民知道哈尔克岛在哪里？特朗普知道。早在1988年，他就说过，如果他当选总统，他要“好好整顿哈尔克岛”。

美国统治阶级早就知道哈尔克岛的具体位置。他们不习惯受辱，一旦遭受羞辱，便会耿耿于怀。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让他们从伊朗那里遭受了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

理性与他们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对美国人来说，现在“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承认战败，并就撤军进行谈判。这意味着承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大幅下降。

但美国统治阶级无法想象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世界。就连谈判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都十分陌生。美国不谈判。谈判就意味着妥协。只要美国想要什么，它就会用霸凌和恐吓来夺取。

因此，这场战争之前的所谓“谈判”根本算不上谈判，只不过是为向该地区运送军事装备争取时间的手段。当美国试图推翻伊朗政权时，伊朗谈判代表仍在阿曼的谈判桌上。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美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谈判同样缺乏诚意，反映出同样的心理基础。

转折点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但万物终有尽头。最终，量变必须转化为质变。首先，美国的接纳将以色列塑造成一个如今正被其内部矛盾撕裂的社会。

一方面，以色列自诩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法律中根深蒂固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歧视，使这种说法沦为笑柄，而2017年的《民族国家法》更是正式将非犹太人定义为二等公民。

一方面，这里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这里也聚集了一大批狂热的居民，他们笃信《托拉》的字面意义。

一方面，以色列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数量占GDP比重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贫困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名列前茅。

就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的六个月，所有这些矛盾彻底爆发。以色列陷入了大规模的抗议、“总罢工”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统治阶级内部也爆发了战争。

内塔尼亚胡成功地用一场又一场战争掩盖了这些矛盾，而这一切始于加沙。这样做，他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将以色列社会的矛盾推向了极致，从而延缓了清算之日的到来。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经过三年由征兵制军队持续作战，在黎巴嫩的占领军内部的纪律显然已经崩溃。超过一半的预备役人员在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召时拒绝响应。63%的军官想要退役。

经济困境迫在眉睫。科技初创企业一片混乱。大量适龄劳动人口应征入伍。心理健康问题如同流行病一样。最重要的是，以色列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统治阶级一直塑造的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形象已然破灭。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兑现其存在的理由：即能够保障以色列犹太居民的安全。

在每个阶段，内塔尼亚胡都不断加码，以维系政府并保全自身。到目前为止，他都成功了。但以色列内部的矛盾却一再重现，而且每次都更加激烈——正如我们所见，人质家属对内塔尼亚胡的愤怒，以及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面临失去兵役豁免权而产生的愤怒。

这一切最终都会达到极限。

美以关系的未来

美以关系也终将达到极限。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正在严重削弱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

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同情以色列（54%）而非巴勒斯坦（31%）。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如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35%）少于支持巴勒斯坦的人（41%）。在年轻人中，这一比例更为显著。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巴勒斯坦（53%），而支持以色列的仅占31%。

这是美国公众意识前所未有的转变。正如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所说：“我从未见过公众舆论在任何问题上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包括同性婚姻……就像它在美以关系上发生的变化一样。”

民主党人正感受到压力。来自以色列游说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资金已成为一些民主党政客的“致命一击”，以至于有消息透露，AIPAC不得不诉诸隐秘的秘密渠道进行资助以避免身份暴露。共和党人也同样感受到压力。“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支持者群体也因这个问题而分裂，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人物指责特朗普从“美国优先”转向“以色列优先”。

尽管如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决裂呢？撇开以色列在美国帝国主义心理中的地位不谈，还有另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我们将尝试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在美国帝国主义开始衰落之前，在它成为世界霸主之前，曾存在过英国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强行任命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Storrs）为耶路撒冷军事总督，此时英国正以新的殖民统治者身份接管巴勒斯坦。他自诩为“自本丢·彼拉多以来第一位耶路撒冷军事总督”，这让他颇为得意。英国鼓励犹太人移民，并挑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撰写的自传中，斯托尔斯解释说，英国帝国主义者曾设想在“一片潜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中，为自己打造一个“忠诚的犹太阿尔斯特小王国”（注：“阿尔斯特-Ulster”原本是爱尔兰四个传统省份之一，后常指代北爱尔兰的新教群体或亲英派）。正如17世纪英国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在盛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安插了大量新教徒一样，像斯托尔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也设想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中扮演类似的角色。

基本上，“忠诚的犹太阿尔斯特小阵营”出现了，只不过他们效忠的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中东和爱尔兰的情况或许有些相似之处。随着英国帝国主义的衰落，随着其帝国的瓦解，其在爱尔兰的利益也发生了变化。战后时期，北爱尔兰已经去工业化，英国几乎不再需要常驻军队来抵御来自欧洲竞争对手对英国西海岸的威胁——英国及其竞争对手都已沦为美国的附庸。

因此，英国不再有兴趣维持爱尔兰的分裂。其所谓的“忠诚的阿尔斯特”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英国人却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阿尔斯特的忠诚主义并没有就此悄然消失在

历史长河中。它继续煽动混乱，迫害天主教徒。它还造就了像伊恩·佩斯利牧师这样的怪物，他发表了大量反对天主教的布道。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矛盾几乎酿成了内战的危机。无论英国人当时的意愿如何——或许“放手”北爱尔兰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都受困于过去的政策。他们无法放手，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陷其中。

英国军队被派往爱尔兰街头，在那里被牵制了数十年，与此同时，英国本土却遭到了轰炸。即便在今天，北爱尔兰仍在给已大为衰落的英国资本主义制造麻烦。看看过去一周发生的那场暴动就知道了。

就像一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织的网里一样，英国帝国主义陷入了它过去编织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曾经服务于它的利益，但它再也无法从中逃脱。

美国帝国主义以更为庞大的规模做了同样的事情，将整个中东地区卷入其中，打造了一个拥有扩张野心和核武器的“忠诚的小阿尔斯特”。即便他们能够冷静地正视现状——而他们丝毫没有这种迹象——他们也无法从乱局中抽身，而这一乱局正日益成为加速其衰落的重要因素。

女性解放专题：女性斗争与阶级斗争

Marie Frederiksen, 转自《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妇女节的起源，妇女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如何为解决妇女解放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经验表明，一旦妇女开始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会消除分歧，团结男女工人，加强妇女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妇女解放是工人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按：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8日）

“阶级斗争就是妇女斗争！妇女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这是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口号，尤其是丹麦“红袜子”女权运动的口号。如今许多人听到这句口号时都会轻蔑一笑，但这句口号一点儿也不好笑，因为无论是在丹麦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妇女仍然受到压迫。

在国际“三八”妇女节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在所有追求公正社会的青年和工人中间，对妇女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左派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妇女受压迫与阶级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家正在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一切分歧来辅助他们对所有工人生活环境的攻势。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分性别；工人阶级的唯一力量在于团结和凝聚力。

我们认为，如果想要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将妇女解放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在丹麦，压迫妇女的现象依然存在。以丹麦为例，通过仔细观察妇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接受教育和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原因。

国际劳动妇女节

1910年8月，社会主义妇女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每年举行劳动妇女行动日的提案。第一年的行动日是在3月的一个星期天，但后来确定为3月8日。

社会主义妇女国际（译按：第二国际妇女处）秘书处领导人、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召集了这次会议，并提议设立国际妇女节。来自17个国家的99名妇女参加了在哥本哈根狩猎路69号人民之家（后称“青年之家”）举行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这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国家被实行。丹麦妇女在1908年赢得了市议会选举权，但直到1915年才获得国家议会选举投票权。

蔡特金的决议案指出：

> “与各国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达成一致，各国的社会主义妇女应每年组织一次妇女节。首先，妇女节应以实现妇女普选权为目标。这一主张应符合社会主义对整个妇女权利问题的理解。妇女节应具有国际性，必须精心筹备。”

会议决定行动日的要求是：

- 争取妇女选举权
- 反对战争威胁
- 为母亲和儿童获得社会照顾而斗争
- 反对物价上涨

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于1907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作为第二国际大会的序幕。1889年，第二国际在恩格斯的主持下成立了。在主导着整个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由蔡特金领导的妇女秘书处。

在此之前，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自由的关系。妇女运动自认为是跨政治的，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07年，工人运动决定将妇女选举权问题放在议程的首位，并停止与“资产阶级”妇女组织的合作，转而开展自己的运动。

现在已经很清楚，社会主义者是为工人阶级妇女而斗争，妇女问题不能与阶级问题和反对一切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分开。

小资产阶级妇女并不认为妇女问题和阶级问题有关，而认为所有妇女在不同的阶级中有着相同的利益。对她们来说，这关系到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成为律师和医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完全平等而奋斗，但我们也要解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法律上的平等可能会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压迫会消失。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这种女性主义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会接受教育、成为医生等，但这并不能解决绝大多数妇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不承认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这一敌人，只承认所有女性与男权社会的争权斗争。

在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了与国际相同的立场，并于1908年通过了以下声明：

- 只有一个工人运动是存在的，负责党员和社会主义选民的教育。
- 党内没有单独的妇女协会。只有各行各业的没有男性工人的妇女工会，其隶属于中央组织管辖。
- 必须为妇女入党提供便利，她们只应支付一半的党费。
- 妇女运动和妇女党派（独立于党）是多余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两翼，俄国革命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分裂。

改良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改良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例如实现全民选举权、争取更高的工资等。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希望能逐步改良社会。

站在另一方的是革命者，其中包括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他们解释说：不能简单地逐步改良社会，资本家的任何让步都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就无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革命派在俄国革命后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该组织坚持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受压迫的妇女

全世界13亿贫困人口中有70%是妇女和女童。发展中国家约有25%的男性因缺铁而患贫血症，而同病症患者在女性内占45%，缺铁导致每天有300名妇女死于分娩。

在发展中国家内，许多地方的妇女仍遭受着野蛮对待，妇女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卖为人妻。在巴基斯坦，如果妇女有损男子及其家庭的名誉，就会被泼硫酸毁容或是被杀害。在法庭审判中，需要五名女性证人才能推翻一名男性的证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Fourier）说过："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幸运的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因此条件才得到了改善，文化也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是，即使条件改善了，法律平等了，压迫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根深蒂固。丹麦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丹麦于1976年通过了《同工同酬法》，从那时起，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停滞在12-19%之间，视职业而定。这种差距既是男性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多于女性的部分原因，又是女性每天在家务劳动（家务、送孩子去幼儿园等）上花费的时间平均多于男性一小时的原因。社会一直在进步，技术的发展理应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时间。可是恰恰相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工作时间都有所增加。

世界范围内对利润的追求和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提高了工作节奏和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延长。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密切相关的世界现象。与此同时，过去三十年来工人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侵蚀，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和福利预算的削减使工人阶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他们要保障对子女和老人的照顾。自1987年以来，男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小时，女性增加了一个半小时。

从法律上讲，妇女不再依赖于男人，但众所周知，作为单身母亲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抚养子女和所有其他实际事物。虽然法律上的依赖已经废除，但仍有千丝万缕的纽带将妇女与男人和家庭捆绑在一起。

历史上女性失业人数远多于男性，女性一直被用作劳动力的后备军，在经济危机期间，她们受到的冲击往往最严重。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欧洲以及丹麦的男性失业人数多于女性，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危机对私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主要是男性。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看到对福利的严厉打击，也就是对许多妇女工作的公共部门的打击。当有大量工人失业时，资本家就会开始雇用男性。(谁会雇用一个育龄妇女呢？）许多妇女于是会想：与其去找一份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工作，还不如多生几个孩子。（译按：丹麦的少儿补贴、儿童津贴、托儿所/不入托补贴等生育福利制度非常发达。）

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工资上可衡量的差别，也不仅仅是谁在家里做什么的问题。妇女问题不止涉及到妇女的生活状况，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针对妇女的偏见和偏执依然层出不穷，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衰落，文化也在野蛮化，尤其是在妇女的代表性方面。

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阶段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世界各地对妇女的压迫有多种形式。但无论妇女受压迫的形式如何，其压迫根源是相同的，因此解决办法也是相同的。

不平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我们将人类物质条件的演变视为根本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解释了妇女受压迫是如何与阶级社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只能生产仅够自己生存的产品，没有多余的产品，因此当时不可能存在不平等。

如果说存在劳动分工的话，那也是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其基础是妇女由于生育、哺乳等原因而在部分时间里被束缚在“家里”这一生理事实。早期原始社会男女分工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但随着生产力的初步发展，两性之间出现了分工。妇女的任务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就是采集草根、浆果等，尤其是做饭。男人的任务则是狩猎、在战争中保卫领地等。许多研究表明，妇女的作用对早期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妇女受到极大的尊重，例如，氏族以母系血缘维系，因为在生理上母亲是唯一可以确定的父母（译按：氏族社会的群婚制难以确定谁是孩子的父亲）。

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社会完全不同。虽然父权制是一个女性受压迫的社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父权制之前的母系社会里女性压迫过男性，只有两性间的相互尊重。当时没有我们今天所知的父亲和母亲组成的家庭；家庭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生活，抚养下一代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展出了能够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生产方式。他们开始耕种土地、建造围栏和饲养动物。人类第一次开始生产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也意味着第一次出现了不平等。一些人开始比其他人拥有更多，随之产生了阶级社会。除了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之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出现了。属于男人的传统工作开始创造剩余，这使他们处于优越地位。这意味着男人如果想把财产留给后代，就必须以男性血脉为纽带，于是男性主导女性的家长制家庭出现了。

>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女性开始沦为生殖机器和男性奴役的对象，男性凭借他们掌握财产的事实，依据手中的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开启了男性的统治时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妇女的压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与反对阶级社会的斗争密不可分。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导致了国家的兴起，压迫的观念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妇女解放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了女性在世界历史上的失败是如何导致妇女的工作失去其社会性的。同时，他还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第一次改变了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整个家庭都被卷入了生产，这一方面给妇女带来了有偿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另一方面也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作，妇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参与阶级斗争。

>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
>
> 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

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的重点）”

在丹麦，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复苏，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世界市场也得到了扩展，这使得福利得以扩大。家务劳动的普遍减轻以及育儿、照顾老人等压力的减小，使妇女有可能从事有偿工作（丹麦的育儿比例居世界之首）。与此同时，丹麦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雇用了许多妇女。

丹麦的女性就业率，即劳动适龄妇女的工作比例急剧上升。1960年，女性就业率为33.9%，而男性就业率为83.6%，但到1981年，女性就业率上升到70.8%，而男性就业率为86.8%。1998年，男性就业率降至81.6%，而女性就业率则增至73.2%。

1967年，妇女在劳动力中占80万人，1998年的相应数字为130万。1967到1998年，劳动力总数从230万增加到290万。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相应数字如下：

1971年英国：女性占42.4%，男性占80.6%。

1973年美国：女性42%，男性75.5%。

1990年英国：女性为50.3%，男性为70.5%。

1990年在美国：女性54.3%，男性72%。

2008年英国：女性56.2%，男性68.5%。

而在瑞典，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975年：42%；1980年：45%；1985年：47%；1990年：48%；2008年：47%.

妇女参加工作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而已。战后的复苏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危机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初。福利的扩大或多或少地停滞了；公职人员的条件年复一年地受到攻击。儿童、病人和老人的条件恶化，这尤其给妇女造成了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并没有为劳动妇女或世界大多数人口创造繁荣，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才能为全面解放奠定基础。

妇女斗争与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消灭妇女压迫的**潜力**已经形成，同样，废除一切压迫的基础也已奠定。资本主义最初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它将生产手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现在可以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没有人需要遭受苦难，不平等可以通过大幅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来消除。然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人类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疲于奔命；新技术的引入是为了让人们更快地工作，而其他的人则被解雇。

有了计划经济，我们就能立即提高产量，并利用技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工作时间将立即缩短，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我们还将能够引进一系列其他东西，使我们更接近妇女解放。

首先，我们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共福利，使工人及其子女、老人和病人获得体面的条件。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技术来消除或多或少的家务劳动。扫地机器人、人人都能使用的洗衣机、公共洗衣房、市民餐厅、人人都能享用的优质健康和廉价食品、所有幼儿园、学校和所有工作场所的膳食、翻新的住房、公共窗户清洁、清洁帮手等等，将仅仅是人类解放任务的开始。我们目前的前景受到当前形势的限制；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发展所有这些有益于人类解放的事物。

但这一切都不会自动实现，这需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消除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接管最大的公司，从而控制经济的关键部门。今天，少数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即工厂和机器等。正是他们决定生产什么以及何时生产，这取决于他们能从什么产品中赚取利润。但实际上，财富是由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即工人阶级，他们每天都要为资本家工作。工人阶级必须接管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例如丹麦的200家最大的公司——这样，大多数人才能民主地决定生产什么，才能制定出尽可能利用现有技术和生产的计划，从而提高产量，降低工时。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一切奴役女人和男人从事家务劳动和为他人工作许多小时的现象。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人类在文化、科学、创造力等方面的真正潜力将首次得到充分发挥。

俄国革命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非常重视妇女问题，十月革命首次允许了最广大的群众参与政治。

>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23日）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法律上确立了完全的性别平等。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引入了离婚权、堕胎权和教会外的公证结婚权。但正如列宁所解释的，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远远不够。必须利用生产的发展来建立托儿所、学校、公共厨房，并发明方便家务劳动的机器。今天，这些东西很多都已经存在，但首先它们并不向小市民提供，而且这些服务的质量也不断受到利润的影响。如上所述，无论男女，家务劳动和外出工作都在增加，而自由时间和养育儿童的质量却在下降。

我们的愿景不是分担家务劳动和有偿劳动，而是消除所有苦役。

>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
>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
>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向前推进了，我们已经走上新的道路。”（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

但是，苏联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消除家务劳动和家庭——想要消除家庭，必须拿其他东西取代它。正是苏维埃俄国的落后和封闭，为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夺取苏联政权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苏联没能发展出新的家庭类型，而是回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机构不是与不平等和压迫作斗争，而是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随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苏联公民，特别是妇女的自由急剧减少。堕胎和自由离婚的权利被废除，工人和农民妇女仍然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苏维埃俄国还对同性恋采取了最先进的态度，但斯大林官僚集团同样将这一点完全推翻了。没有民主，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苏联经济最终崩溃了。

然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并不能成为拒绝社会主义的理由，我们在苏联看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但革命最初几年取得的成就表明，革命是势在必行的第一步，它为妇女和人类的解放奠定了整体基础。

>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得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

> 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公共餐厅就餐，也不意味着永远不允许自己做饭，公共儿童教养也不意味着孩子不能由家人抚养。它的意思是取消了所有强制措施。你不必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和准备盒饭；但你只有在愿意的情况下才会做这些事情。托儿所、学校、休闲中心、医院、老人护理中心等都将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时间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同时工作时间也将立即缩短。

今天，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显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例如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等。与当代发展相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具有惊人的远见卓识。试想一下，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我们今天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那么，我们该如何争取妇女解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男女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

生物学与女性天性

有些人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基础是生物性质的。这种关于生物学的争论有多种形式。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是父权制造成的，而父权制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天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人类早期的历史表明，妇女并不总是受到压迫，并不总是处于低于男性的地位。因此，没有证据表明男性压迫女性是他们的天性，正如人与人之间相互压迫一般也不是他们的天性。天性论是唯心且悲观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还有人提到“女性天性”。所谓“女性天性”的说法与“压迫女性是男人的天性”的说法一样反动。这种观点类似于那些试图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贪婪、自私等。事实上，“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新石器时代的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当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看看非洲原始部落和当今西方世界对女性行为的要求有何不同就知道了。或者看看在好莱坞长大的女孩和在中国农村长大的女孩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是巨大的。

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在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著作《反叛中的理性》中解释了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 “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人性与意识一样，是当时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人性会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原因。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人的特征似乎是通过基因在生物学上固定下来的，这就为‘你无法改变人性’的神话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所谓的‘人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变和再转变。”（《反叛中的理性》，英语版第329页）

但有人会反对，因为女孩和男孩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同。男孩更喜欢玩武器和汽车，女孩则更喜欢玩洋娃娃。（译按：这其实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影响个人的意识的体现。广义上人的经验和成长环境，狭义上颜色被社会赋予的定义，颜色的使用环境和频率，颜色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组合和运用等都会影响人的选择。）最近，一位母亲在电视上回答“为什么给她的女儿买女孩子的玩具”时说：“她太喜欢粉红色了，我相信这是遗传。”这就是我们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生物学论证的庸俗版本。这种思维方式常被用来支持一种反动观点：妇女独自照顾孩子是母性和本能，因此她们天生就属于家庭。

不同的成长环境

如何区分生物学和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从男孩和女孩出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受到不同的教育。当然，这种现象不会自行改变，研究表明，在丹麦和瑞典等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所有国家的固有文化，因为所有国家都存在阶级和不平等。既然男女没有接受相同的教育，我们就无法断定男孩和女孩在行为方式上有什么生理差异。我们认为，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的成长方式无疑影响了他们性格的形成。历史表明，人类的行为方式、所珍视的准则和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性”，而恰恰取决于我们成长环境和受养育的物质条件。

丹麦语言和心理学副教授、专门研究儿童大脑发育的安-伊丽莎白·克努森（Ann-ElisabethKnudsen）描述的一项测试表明，我们是如何从婴幼儿时期就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儿童的。在实验中，一组志愿者被要求照顾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半小时。实验在一个装有隐藏摄像头的房间里进行，孩子被特意穿上了不分性别的衣服，所以无法分辨出男女性别。

> “与孩子一起坐了一会儿后，所有测试者（包括男性和女性）都觉得受不了了。在（孩子）母亲回来之前，所有受试者无一例外都会拉一下尿布，以确认孩子的性别！随后，我们可以从视频记录中明显看出他们的欣慰之情，就好像他们在说：‘哦，你就是那种性别！’：‘哦，你真好！现在我知道怎么抱你、和你说话、和你玩了。’这发人深省，尤其是考虑到三个月大的女孩和男孩在生理需求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对待幼儿方式的不同，可能深深依赖于我们无意识的性别期望”（安-伊丽莎白·克努森：《好女孩和笨男孩》，2002年）

克努森的基本观点是：“大脑的发育会受到影响。”因此，当我们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时，他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不同。幸运的是，大脑的发育贯穿一生，因此也会受到整个生活的影响。

实验表明，女孩和男孩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不同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女性天性”和“男性天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女孩和男孩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说女性属于家庭、不懂数学或在其他方面不如男性是没有生物学依据的。就像说男人有压迫女人的生理冲动一样，也没有任何依据。人类的发展是受环境影响的。

女童和男童从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同的期望，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停滞，以及文化的退化，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瑞典监察专员最近谴责了玩具反斗城的一本玩具目录，因为其中的性别定型观念太强。只要翻开最近的玩具目录，就会发现页面越来越多地分为粉色和蓝色：带车把篮子和儿童座椅的粉色儿童自行车适合女孩，而两侧带火焰的蓝色自行车适合男孩；洋娃娃是女孩玩的，而乐高积木则是男孩玩的。

大脑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旦消除了目前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负担，人类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这无关性别。当人

类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获取每日的面包时，就可以将精力用于发展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所拥有的才能。

社会建构主义?

为了反对这类反动论点，即女性受压迫是基于生物学的自然现象，女性主义中出现了一个学派——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者正确地指出，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并不是先验的生物学给定的。但社会建构主义者不仅否认生物学的作用，还否认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没有完全没有物质基础。

罗斯基勒大学副教授克里斯特尔·斯托姆霍伊（ChristelStormhoj）这样解释道：

> “生物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之间的差距已经消除。身体在逻辑上或时间上并不存在于其表述之前，而是一个真实的客体[…]这意味着，通常所说的生物性别被视为部分由话语和规范构成（译按：注意！后现代主义哲学最常用的词“话语”、“叙事”、“脉络”、“规范”，他们认为社会交往中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能通过改变“话语”和“规范”来根除一切不公。），因而是一种效果[…]因此，性别不能被视为建立在[…]话语之外的物质性基础之上。”(斯托姆霍伊：《社会科学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理论立场》，载于《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理论》,2003)

许多左翼青年被这些观点所吸引，因为它们断然拒绝生物学论证，批判既有的压迫性体制规范，表达了对当权者的普遍反抗。关于性别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已经有许多有趣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对社会建构主义，因为这种理论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改变对妇女的压迫。

首先，我们必须自问：这种社会建构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你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社会建构是相互演变的。是的，但第一个建构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建构朝着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发展？社会建构主义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它不是人们日常所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美好的理想，而是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它把历史解释为思想的历史，把人们的行为解释为抽象的思想，而不是物质的需

要。在哲学唯物主义中，观念和思想也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脱离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的。

因此，解决方案同样变得模糊不清。如果重要的是社会建构、规范和语言，而物质基础并不存在，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扩大规范的范围，证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这就产生了大量（通常是好的）文章、研究等，展示压迫性的规范，以及各种家庭和生活形式的“社会实验”，例如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看到的。许多实验，例如集体生活方式，都有许多好的一面，例如共同分担家务、照顾孩子等，但它们无法解决压迫问题，特别是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压迫的物质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经解释过，社会结构、思想、规范、观念都有其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没有物质的大脑，就不可能有思想，也就不可能有性别、构造等概念，而物质的大脑需要身体，身体又需要吃喝。思想和规范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马克思是这样解释这种联系的：

>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
>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物质决定思想，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思想也会发生变化。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机械地看待物质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试图这样声称，而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也一直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机械地看待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了绝对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了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

>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弗·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

事实上，人类意识是非常保守的。在正常的历史时期（占绝大多数时间），它远远落后于物质基础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不愿参加斗争，会默默接受老板的一切攻击。但是，不能根据任何特定时刻的表面情况，就意识和阶级

斗争如何发展得出结论。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宗派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丧失了革命意识。

在工作场所，表面上可能风平浪静，工人们默默地接受老板说的一切：他们不能互相打招呼，否则就会被解雇；他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必须提前15分钟到公司换衣服；多工作半小时，等等。一切秩序井然，什么也没发生。但终有一天，工人们受够了，他们不准备再接受任何东西，于是他们开始罢工。正如《圣经》所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thelastshallbethefirst.）”

意识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上升的。在斗争过程中，意识会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迅速向前。这显然不是直线前进，既有失败、挫折，也有向右和向左的转折。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每走一步，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要尽我们所能，提高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

> “物质与意识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但他们是在物质条件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当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时，最终也会改变思想。
>
>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
>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1845年稿本）”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必须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压迫妇女和对妇女的任何偏见。但是，即使我们反复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以及废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也只有少数人会因为读了一本书或听了一次政治演讲而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斗争，绝大多数人才会得出革命性的结论，妇女问题亦如是。

女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女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女性主义者将妇女问题置于阶级问题之上或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等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之中有真正承认存在阶级压迫的人，但也有许多人拒绝承认阶级压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阶级压迫是根本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贫穷的黑人妇女可能不会比白人男性工人更痛苦。这意味着，阶级分化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所围绕的基本矛盾。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对妇女的压迫起源于阶级社会。妇女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阶级问题也离不开妇女问题。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反对一切分裂。妇女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随着普选权等最基本的法律权利的实现，妇女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资产阶级太太要求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捍卫自己的财产，简而言之，分享他们的特权。而劳动妇女则被允许与她们的丈夫一起分担劳动，与她们的男人一起分担家务，与她们的男人平等地经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当然，我们会为实现男女法律平等的所有要求而斗争，同时我们坚持阶级路线，并解释说任何民主进步都只能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跳板。

另一方面，妇女的斗争显然也是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资本家不择手段地分化工人阶级，如果他们能让一部分人接受较低的工资，就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造成压力。如果他们能让一部分工人看不起另一部分工人，这就会分裂反对资本家的共同斗争。工人阶级的唯一力量在于跨越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的团结。因此，反对压迫妇女符合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妇女问题不仅被左翼提出，也被右翼蛊惑利用。例如，丹麦人民党（DanskFolkeparti）就利用妇女问题发表针对丹麦移民问题的种族主义言论，口头上声称为妇女解放而战，但实际上却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种族主义和压迫无产阶级的行动。

例如，反对穆斯林家庭强迫婚姻被用来作为实施24岁移民规则（24YearRule）的论据，（译按：该规则规定，非居民配偶只有年满24才能与居住在丹麦的居民配偶团聚和同居；这对夫妇的联系必须比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更牢固，除非一方已经在丹麦居住超过28年；必须有10万丹麦克朗的担保，担保金额每年随通货膨胀变化；一年内没有领取过现金补贴或失业救济金，不欠当局钱，

并有福利金两倍以上的收入供养伴侣；夫妇必须证明他们拥有或租有房屋，人均面积至少20平方米，每间房最多容纳2人。）

这一民族主义的和反移民主义的规则实际上是在攻击家庭团聚权（译按：家庭团聚是一项普遍权利。当难民被迫逃离祖国时，他们的家庭有时会被拆散并长期分离。各国有责任通过家庭团聚程序保护和恢复难民的家庭生活。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保障难民家庭团聚的基本权利；我们努力为失散的难民家庭提供支持，并增加他们利用家庭团聚程序的机会。），它对强迫婚姻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打着保护妇女的幌子而已。顺带一说，它也无法阻止强迫婚姻，妇女完全可以被强行送往另一个国家结婚，比如挪威和瑞典。（译按：由24岁规则拒绝居留许可的案件中，通常只有不到1%的夫妇的婚姻涉嫌强迫或权宜婚姻。如2004年的2808例拒绝案件中只有7例与强迫婚姻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解放甚至一再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入侵阿富汗辩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妇女问题来分化工人阶级并引入各种反动观念的。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

不幸的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也悄然进入了工人运动的某些领域，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却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丹麦左翼的许多人提出了在丹麦公司中增加女性管理人员的要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不会成为老板的女性来说，这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至于她们应该从女老板还是男老板那里领取越来越低的工资，或者是女老板还是男老板解雇她们，这都没有任何区别，这都不会改变她们的处境。支持增加女性管理者的一个论点是，事实证明，有女性进入董事会，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就会是正数——这实际上意味着她们从男女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女高管、女教授、女政治家的家务可以交给拿很低报酬的女保姆，而职业女性却要承受长时间工作、日托服务开放时间缩短等巨大压力。这些要求模糊了阶级对立，纵观历史，资产阶级一直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营造一种“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感觉。

美国黑人中的佼佼者获得了很好的职位，给人一种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的错觉，而实际上绝大部分黑人仍受到系统性压迫。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生活境况会发生改变。

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对大多数美国妇女来说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今天德国的安吉拉-默克尔的上台都不能说是向妇女解放迈进了一步——情况恰恰相反。

妇女问题也被用来支持劳工运动中的右翼。在社会民主党主席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海勒·托宁·施密特（HelleThorningSchmidt）击败弗兰克·延森（FrankJensen）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名女性。在LO（丹麦工会联合会）上一次总书记选举中，左翼候选人哈拉尔德·伯斯汀以同样原因（HaraldBørsting）击败右翼候选人蒂内·奥尔维格-胡根伯格（TineAuervig-Huggenberger），赢得了选举。

处于工运高层的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可能远离普通群众，背叛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决定一个人能否最好地领导妇女解放斗争的不是性别，而是这个人的政治立场。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任何积极的性别歧视，例如按性别划分的发言人名单，党的领导机构、董事会中的特殊配额等。我们反对在董事会中为女性保留特别配额和席位。右翼往往利用这一点来提拔自己的人，反对真正的阶级斗士。政治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必须决定工人运动领导层中的多数。我们还拒绝所有类似于在运动中对会议发言人名单进行性别隔离的提议。关键在于思想，而不是性别。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除了这些完全无法使更多的妇女走上历史舞台的倡议之外，还贬低了广大劳动妇女，暗指后者不能表达“真正女性”的观点，不能为理想而奋斗，不能凭借想法和作秀赢得配额席位和优惠待遇。

我们反对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倡议，因为它们分裂了工人阶级，使得男人反对女人，女人反对男人。我们在整个工人运动中为使妇女问题得到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的重视和讨论而奋斗。

早期工人运动中的妇女斗争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妇女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妇女就参与了阶级斗争。丹麦第一次有妇女参加的罢工发生在1886年，鲁本斯蒸汽纺织厂的225名无组织妇女自发使工厂停转。

如今，妇女占劳工组织成员的49%，但妇女的组织并非一帆风顺，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她们的组织程度和参与阶级斗争的程度也在增加。下面简要介绍丹麦女工中的一些重要斗争，特别是汲取的经验教训。

许多女性主义者拒绝共同斗争，她们解释说，工人运动中的男性过去和现在都是沙文主义者，妇女必须单独组织起来，而这是自1871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和丹麦妇女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工人运动中曾经存在偏见，而且现在仍然存在，但历史表明，通过共同的斗争，这些偏见是可以打破的。

鲁本斯蒸汽织布厂的罢工妇女加入了纺织工人工会，并得到了他们的罢工支持，但罢工最终还是失败了。工会领导把这次失败说成是“女性天性”的表现，认为这是由于妇女不懂得团结，不了解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斗争。这是丹麦劳工运动中工会领导层第一次将失败归咎于罢工者本身，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当妇女参与其中时，女性的天性总是难辞其咎。”这种情况和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牌匾漆工纠纷中再次发生，等下我们会讨论这一问题。

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许多工会不对妇女开放，尽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妇女约占所有产业工人的20%。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女性有偿就业，例如女佣。对于许多工薪家庭来说，妇女的收入非常重要，而对于单亲母亲家庭来说，妇女的收入更是至关重要。

尽管妇女通常更难组织起来，部分原因是许多妇女在家工作，因此完全与世隔绝，但妇女组织仍在稳步发展。19世纪90年代末，丹麦约有20%的女性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这一比例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国家。

从1888年起，丹麦社会民主党将“不分性别、种族或国籍的人类全面解放”纳入其纲领，并要求男女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和同工同酬。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内部过去和现在仍然没有偏见，也不意味着劳工运动在许多方面对妇女问题从未采取过反动的态度。但是，女性主义者对工人运动在妇女问题上的批判有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进步。

在工人运动中，妇女应该待在家里的理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男人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因此工人运动的目标就是让男人获得足够的薪水，这样妻子就没有必要工作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工薪阶层妇女都无法承担全职太太的代价而必须外出工作。

今天，我们很容易说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进步，但在19世纪末以后，工人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可以从事医生或律师等职业，而工人阶级妇女只能希望从事10-15个小时的艰苦繁重工作。同时，也没有公共托儿所，资产阶级妇女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工人阶级妇女来说却难有两全法。

女性主义者还指责工人运动偏袒技术男工的利益，将妇女的利益置于一边，并以禁止在家工作的讨论为例进行了强调。在工人运动的早期，许多人都在家工作，例如裁缝。而对许多妇女来说，这是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唯一途径。工会争取禁止在家工作，因为这会分裂工人阶级，而且在家工作的工人组织不力。女性主义者反对这项禁令，她们的回应是，这表明妇女必须置身于工会运动之外。马克思主义对此的回答是，工人运动必须提出要求，为所有人提供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生活工资和人道的工作时间。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
>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

> 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利益。”（《共产党宣言》）

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劳工运动是绕不过去的，妇女问题不能被视为与阶级斗争问题相分离。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也并不只是在妇女问题上没有进步路线，纵观历史，工人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裂。例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一直相互对立。

正如我们最近在2008年春季看到的那样，在与工资谈判有关的公务员罢工期间，公务员、护士、托儿所工作人员、老人护理人员等不同群体因不满提出的工资协议而举行了长达数周的罢工。一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公务员工会的领导人在媒体上要求，罢工者的工资不得高于拟议的协议，以防他们的成员可能感到不满。参加罢工的不同工会的领导人也相互争斗；例如，护士工会（DSR）的领导人就非常强调社会和医疗工作者的收入不应高于护士的要求。这次罢工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要求为低收入妇女行业提高工资的一个公开案例。

然而，尽管工会领导人相互争斗，但罢工确实打破了一些偏见。随着妇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也成为了斗争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共同的斗争，跨性别或宗教等的团结才得以建立。

1875年发生了这样一场劳资纠纷，资本家想要将组织起来的妇女将接替罢工男子的工作。这改变了烟草工人工会的态度，他们意识到也必须把妇女组织起来。烟草工人的总书记在罢工后说：

> “由于一种令人遗憾的错误观念，迄今为止，女工和男工一直作为竞争对手相互敌视。但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所有工人必须团结一致地抵御来自资本主义的攻击。在这一理论中，我们还明确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因此，从事同样工作的女工必须获得与男工相同的报酬。”(拉森一世：《丹麦劳动史》，2007年，第376页)

20世纪70年代牌匾女工的罢工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野猫”罢工（即官方认可的谈判程序之外的罢工）越来越多。在许多罢工中，包括在工业罢工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1954年的菲利浦罢工中，大多数雇员都是妇女。

在整个1960年代和70年代初，女工们通过斗争提出了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不分性别同工同酬的要求。1970年代，新的群体开始参与罢工行动，主要是公务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幼儿教师、护士等开始将罢工行动作为一种武器。

1970年代妇女中最著名、最重要的罢工之一可能是1972/73年皇家瓷器厂女牌匾漆工的罢工。这次罢工成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榜样，引发了其他工人的大力声援，同时也表明妇女当然能够罢工。

大约150名在皇家瓷器厂绘制牌匾的女工抱怨工作条件恶化，计件工资下降。工厂管理层同意就新的工资协议进行谈判，但两周后又终止了新协议。牌匾女工拒绝按照旧协议工作，但会继续按照新协议工作。她们要求工厂遵守提前两个月通知终止当地协议的标准。在此背景下，工厂管理层以罢工为由将她们遣送回家。牌匾女工们每天都到工厂示威，要求按照新协议上班。

劳工法院受理了这一案件，法院同意了这些妇女的说法，即工厂非法废除了当地协议。劳资争议法庭判处工厂因非法终止当地协议而支付20000丹麦克朗的罚金，但同时却因牌匾女工的非法罢工而判处她们72000丹麦克朗的罚金。

在罢工期间，牌匾女工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她们向自己和其他工人阶级表明，妇女可以罢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领导阶级斗争。牌匾女工们每天都开会讨论罢工问题，许多以前不敢在大型集会上发言的妇女也开始参与讨论。牌匾女工们还组织参观了其他可能的工作场所，并介绍了她们的罢工情况。各工作场所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总共募集到了352,311丹麦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劳资争议法庭的判决又引发了全国各地自发的募捐活动，总共又募集到了60,000丹麦克朗。

工会和劳工组织领导了劳资争议法庭的谈判，但没有让牌匾女工参与其中，而且普遍对这些妇女不屑一顾。当牌匾女工们询问

什么是专业仲裁时，她们从工会代表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一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间。[…]说再多你们也不会明白。”(劳工组织主席托马斯·尼尔森（ThomasNielsen）对媒体评论说，牌匾女工们被处以巨额罚款是她们自己的错，她们是“愚蠢、固执和愚昧的”（《女漆工的奋斗》，1974年）。另一方面，来自工作场所的巨大支持表明，虽然工会领导层对牌匾女工不屑一顾，但工会的普通员工绝对不是这样。

当女性主义者指责工会由男性主导时，她们忘记了领导层和基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般来说，工会领导层对基层成员的行为普遍都很傲慢，这不分性别，特别是针对边缘群体。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层员工中建立团结，反对工人阶级的这种分裂，从而向领导层施加压力，而不是帮助加剧分裂。

罢工本身与妇女问题无关，但罢工本身也向参与罢工的妇女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牌匾上的一位女工解释了这是如何产生的：

> “我想我们一直都认为，尽管我们只是女人，但也不应该让她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直到去年，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不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人类。以前人们无法想象妇女可以坐下来参与罢工，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许多地方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一群妇女能够坚持这么久而不与自己为敌，这是男人对女人的老式看法。但事实是，罢工对许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对类似的男性群体来说更大的问题。”(蒂格森/Thygesen,《劳工斗争的经验教训》,1974年，第66页）。

许多妇女认为，冲突发生在三条战线上，即资本家、工会和家庭战线。对于单身母亲来说，卷入争端显然是很难的，但对于许多有伴侣的妇女来说，当她们的男人不理解罢工是为了什么并抱怨被忽视时，她们也很难接受，罢工导致了几位牌匾女工离婚。罢工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对相关人员的个人影响，离婚并不罕见。

正如几位牌匾女工所描述的那样，“她们醒悟了”，而这也改变了家庭的状况。一些妇女随后成为工会的积极分子。但是，单靠一次罢工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人们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开展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斗争。罢工结束后，一位牌匾女工的评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 “现在我们回去工作了。很奇怪，我满心欢喜，但同时也痛苦万分。我又要开始计件工作了，我不应该思考，不应该说话或行动，我难以忍受这种折磨。我看着我的同事们，他们的日子也一样难过吗？我们不可能真的再次成为生产机器，没有任何机会讨论和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蒂格森/Thygesen,《劳工斗争的经验教训》,1974）。

争取同酬

在女工多年的压力下，特别是在造船厂起重机女司机罢工期间，以及在工会妇女和红袜子运动的联合行动下，同工同酬于1973年被引入私营部门的集体协议中。丹麦女工工会（KAD）多年来一直坚持同工同酬的要求。1945年，她们在工资协议中采纳了这一要求，整个1960年代，几个工会都将同工同酬提上了议事日程。更广泛地说，作为社会思潮激进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社会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年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提出妇女问题，并组成了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被共同称为“红袜子运动”（Red-stockings）。“红袜子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红袜子”的第一个著名活动是在Strøget（哥本哈根的主要街道）焚烧胸罩，活动当天，她们来到图博格啤酒厂散发传单，呼吁同工同酬。

红袜子活动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要求的关注，但只有当工会中的职业妇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提出这一要求时，这一要求才有可能得到落实。1971年成立了一个同工同酬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活跃的工会妇女，特别是来自KAD第5部（产业工人）、“红袜子”以及可能来自其他团体的妇女。参与该小组的不是全国性的KAD，而是工会中的左翼。该团体组织了一次同工同酬示威游行，并在哥本哈根的大型工作场所散发了13000份传单，几个主要工作场所的妇女也参与了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1971年2月8日举行的示威游行有数千人参加，图博格公司的女工举行了罢工。

示威游行和越来越多的非法罢工（如牌匾女工罢工）给工会领导层带来了压力，KAD的总书记在1971年的集体谈判后威胁说，如果1973年不实行同工同酬，女工就会举行大罢工。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开始在社会民主党内蔓延，并于1976年通过了《同工同酬

法》。同工同酬的斗争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工人运动的所有成员，从而使领导层受到了压力。

“红袜子运动”引发了一些重要的辩论，许多“红袜子”也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红袜子运动”继续沿着女性主义的道路前进，建立了独立的妇女组织，并将重点放在“纯粹的”妇女问题上。工人运动和一些左翼人士被认为缺乏与妇女的团结，被指责带有性别偏见。也许部分情况下确实还存在许多偏见，例如，丹麦总工会总书记托马斯·拉森（ThomasLarsen）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工人运动之外成立单独的团体是没有出路的。活动无论多么轰轰烈烈，新闻报道如何铺天盖地，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必须在工人运动内部、工会和工人政党中开展斗争。

随后我们看到，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丝毫没有改变，同工同酬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女性受压迫问题完全无法通过法律和协议来解决。

在2010年春季丹麦的下一轮集体谈判中，同工同酬似乎可能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一些工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将其作为一项主要要求。这无疑是积极的一步，但目前工人阶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而且失业率还在不断上升，各地的资本家都在利用解雇的威胁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施加压力。同工同酬的要求很有可能被资本家用来要求冻结最低工资，甚至降低男性工人的收入。我们决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这将分裂工人阶级。我们必须要求资本家立即纠正这种情况，执行30多年前在集体协议和法律中商定的同工同酬！

公务员参与日益壮大的罢工浪潮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女性，在1970年代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中，她们开始与其他工人阶级平等地举行罢工。丹麦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严重的隔离性，女性占市政部门工作人员的75%，而男性约占私营部门雇员的66%，妇女的状况与公务员的状况密切相关。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公共开支被大幅削减，公务员的优厚就业条件被取消，私有化浪潮兴起，公务员的工作条件普遍受到破坏。每名教育工作者或教师负责的儿童人数，或每名家庭护理负责的老人人数等都有所增加。

从2001年起，右翼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但从千年之交开始，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群众抗议活动开始恢复力量。几年来右翼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议会进行削减福利，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运动。2006年秋，许多城市的幼儿园教师和其他人员举行了罢工。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arhus）的托儿所教师率先举行了长达4周的野猫罢工。2007年夏天，一个全新的群体开始行动起来，社会和医疗保健工作者开始举行罢工，以争取更高的报酬。

自2006年春季起的18个月内，共举行了三次反对削减福利的示威游行，参与人数超过10万。这些男女劳动者缺乏的不是战斗精神或勇气，而是缺乏领导。公职人员工会并不支持罢工，也不协调各市的罢工，因此罢工频频失败，削减福利的行动仍在继续。

2008年春，公职人员集体谈判导致护士、幼儿教师以及社会和医疗保健工作者举行了多周的罢工行动。他们的要求是“同工同酬”和“女工拿男人的工资”，但其含义并不明确。如前文所述，各工会领导人，无论是罢工的还是未罢工的，都再互相争斗内讧。一个生动的画面是，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在市政厅广场举行了护士示威游行，在议会前广场举行了教育工作者示威游行。工会领导层再次决定身披“黄”甲，虽然DSR护士工会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但领导层明确表示：同工同酬更多地适用于护士，而不是社会和保健工作者。

就如同牌匾女工们，罢工意味着相关职业妇女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1973年，护士们第一次举行罢工，当时她们就表示要打破将护士工作视为一种神圣使命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精神的观念，罢工者在2008年的罢工中重申了这一点，这被称为“乖女孩”的终结。

这次罢工以失败而告终，工资涨幅微乎其微，这不是因为罢工者，而是归咎于罢工工会的领导层。工会领导层之所以没有让罢工者参与决策，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对罢工的控制，同样，他们也没有协调斗争，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影响力，因为他们没有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场联合斗争，而只是一场从州和市预算

中同样有限的资金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让步的斗争。罢工本应扩大到其他群体，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工人，但这可能意味着罢工会完全脱离领导层的控制，出现类似于1985年丹麦大罢工的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明白了，工会领导层的性别并不决定他们是否会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DSR护士工会的领导层中90%是女性，她们在确保罢工胜利方面并没有发挥比其他工会领导层更好的作用。其次，在罢工期间，公共部门工人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一大批工人阶级妇女的人物也变得明朗起来。实际上，他们的雇主是政治家，但同时政治家又否认自己有任何责任，并提到了“丹麦模式”：即在丹麦，工会斗争和政治问题应该是分开的。但事实上，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尤其是对公共部门的工人而言。为公职人员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同工同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无法仅靠工会来解决。

工会和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团结名单）的工运领导层本应共同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以消除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差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右翼政府的政策之外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公务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确实没有私营部门工人那样的影响力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罢工的目的是打击雇主的腰包，但当公职人员罢工时，政治家的腰包却不会受到影响；相反，他们往往会影响到儿童、老人和病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例如护士在罢工时总是提供应急人员。这意味着，尽管在2008年的罢工期间所有护士都正式罢工，但在许多医院科室，值班护士的人数比平日还多，因为应急人员比日常人员多，这也体现了工作条件的疯狂和恶劣。

公务员不可能独自赢得这场战斗，他们必须呼吁私营部门的工人并让他们参与进来，因为私营部门在实现体面的福利服务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公务员和私营部门工人之间的分裂应予以克服。以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议是同时谈判达成的，例如，幼儿园教师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这在1985年的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被分割开来，分别谈判合同。我们必须呼吁消除组织内部以及薪酬和条件谈判中的所有分歧。

争取妇女解放！

妇女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到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革命中也是如此。俄国革命是由俄国妇女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要求面包与和平而发起的。今天，尽管许多参与近期罢工的人已经幻想破灭，而且当前的经济衰退总体上导致罢工数量暂时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每一次斗争中，整个工人阶级都会学习到宝贵的经验，无论斗争是以胜利还是失败告终。目前的僵局只是暂时的，表面之下正在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是，现在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斗争！公务员罢工的结果之一就是加入和投票支持社会主义人民党的人数大幅增加。

工人阶级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战斗，他们要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来领导这场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从根本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开展一场改变社会的斗争。这样才能为妇女的全面解放和消除一切压迫奠定基础，妇女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创造一个能够解放妇女和全人类的社会。纵观历史，女工们展现了她们的勇气和战斗精神，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共产主义问答："没有独裁者，还有独裁制度吗?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独裁者和其背后的国家机器在各阶级间扮演的作用。在历史上，中共官僚面对苏联的解体，为了维持自身政权的延续进行资本主义重建。在尖锐的新阶级矛盾下，中共必须通过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秩序。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共官僚一手扶植起来的，与官僚利益联系极深，依赖官僚的政策支持和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也普遍很低，难以向工人阶级进行不伤根本的改良，因此整体而言中国资产阶级更倾向于用中共的专制国家进行直接的暴力镇压，而不是运作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来采取坑蒙拐骗的间接镇压手段。建国以来中共在全国建构起的波拿巴独裁，在资本主义重建之后依旧保持其独裁性质。重建资本主义前，计划经济下没有苏维埃，没有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中共当时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重建资本主义后中国工人实际上也没有权利集会、组建工会、和组织抗议游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人权利他们都没有。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被剥夺是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最典型特征，不因是一小撮人或是一个人主导专制政权而产生本质区别。

2012年习近平上台，专制统治进一步升级，更为明显地表现为个人独裁，但他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强硬的政治手腕，而是在于2008年后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斗争日益加剧，中共需要加强镇压工人运动和群众的不满意见。习近平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借此取得了中共高层大部分官僚的信任，代表着整个官僚阶层进行维稳。说到底如果没有习近平，也可能有其他的独裁者个人来完成镇压工人阶级的任务。其专制本身也是依赖于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尽管他压制了马云、逮捕了许家印等大资本家以杀鸡儆猴，但根本目的仍旧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整体在中国的稳定。所以即使某个独裁者消失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专制国家也不会消失，民主权利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工人阶级奋勇斗争才能得到。